

# 前 言

欧洲正面临着威胁。

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从金沙萨到比勒陀利亚，欧洲防务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正在崩溃。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表明，苏联就要赢得这场赌博了：它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即将赶上并超过美国。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涉及到欧洲战区这个所谓的“灰色区域”，因为这个战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成为两个大国的赌注和抵押物。

1979年1月15日，《世界报》有这样一条标题：《苏联总参谋部正在提高华沙条约部队的干预速度：在欧洲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只要四十八小时即可准备就绪》。面对着雄心勃勃的苏联，美国却无所作为。美国耽溺于同中国调情，在非洲和波斯湾的不稳定的局势面前又显得畏首畏尾，这样它就势必同欧洲疏远了。

1979年1月4日，西方四大国首脑聚集在瓜德罗普岛，共同探讨了外交前景，估计新的力量对比和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概貌。

多年来，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令人快慰的可靠的安全保护之下，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承担着保卫欧洲的责任；苏联人至今仍继续执行着不可逆转的缓和政策；法国依靠本身的威慑

力量使自己的国土成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应该是研究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有可靠性的时候了。

当今世界变化速度之快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过去有些概念大部分已经过时了。面对着这种情况，欧洲的当权者们在为后代准备什么样的安全呢？

自从 1954 年组织欧洲防务集团失败以来，欧洲安全已经成了人们谈话中的一大忌讳。

然而，欧洲安全的实质性争论依然存在。当欧洲人刚刚选出即将参加欧洲议会的议员时，他们对竞选辩论中那些不现实的方面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有人说，法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独立受到了威胁。但是，如果怀疑我们的某个伙伴国或共同体的某个机构在搞见不得人的勾当，那岂不是认错敌人了吗？

还有人断言，经济危机、失业、财富分配不均才是人民真正感到忧虑的事情。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欧洲由于没有战略手段，缺乏意志和团结，而只得在专制的敌人面前屈膝投降，那还能有什么繁荣昌盛可言，还能有什么社会正义可说呢？

三个年轻的专家——两个是现役军官，一个是大学教授——聚集在一起，讨论了使他们对当前形势感到焦虑的问题，并将他们的共同看法公诸于世。

他们的结论是明确的：由欧洲人自己来组织欧洲的集体防务是刻不容缓的，也是可能实现的。这样做不仅关系到多元化民主制度本身的存在，而且还关系到维护自由和保护欧洲的文化财富。所有的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热爱这种文化财富，因为它使欧洲人确立了自己的

人格。

考虑组织欧洲防务时，不能撇开美国这个盟国，更不能去反对它，否则就会让战略敌手从中渔利。不，决不能这样做，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组织欧洲防务，就是要通过建设欧洲这一极，重建大西洋联盟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加强这个联盟；要使欧洲人产生对自身命运的责任感，从而提高这个联盟的效能。使美、欧双方都能尽职尽责，这才是民主。

在 1946 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温斯顿·丘吉尔曾大声疾呼地说：“站起来 欧洲！”三十三年之后 如果说欧洲已经从它的废墟上站起来了，那也只能说，它还没有完全站立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真正站立起来的基础是它的安全和独立。如今，应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现在，一个生产发达和商业繁荣的欧洲已经存在，而且各方面都很顺利，尽管经济危机带来了某些困难。但是，只有当欧洲找到一种指导思想，并且意识到欧洲各国是休戚与共的时候，欧洲才能前进。加强安全的愿望将促使欧洲进一步觉醒，并将推动欧洲人制订出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

安全必将成为促进欧洲建设的主导因素之一。

本书所论述的观点并没有受任何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它只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不能用和平主义和善良的愿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当出现不平衡或真空的时候，就会发生战争 和平 须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来争取 威胁 决不会由于我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就会自行消失。

只有当欧洲坦率而勇敢地着手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

## 第一章 动乱不安

七十年代初期，欧洲躺在缓和的安乐窝之中。越南战争的结束，似乎标志着在第三世界范围里军事战略对抗行动的结束；国际间的谈判增强了结束东西方对峙的前景，而西方各国的防务预算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它们的防务预算下降了，这说明它们宁愿要改善生活福利，而不要制造坦克。

1975 年以来的先头几年时间中，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伊朗到黎巴嫩，整个中东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宁静的非洲炮声隆隆。在超级武装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备战活动。但是，美国在精神上好象萎靡不振，欧洲忧心忡忡，同时也虚弱无力，因为它处于四分五裂。

我们还应看到，第三世界三十年来一直动荡不安。今后，欧洲也随时可能发生动乱。

欧洲的不稳定因素早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已经处在萌芽状态。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把紧靠西欧、距斯特拉斯堡只有二百五十公里的那一大块欧洲土地拱手交给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控制，在历史的面前，他们对此应承担重大的责任。这个本非属俄罗斯人的欧洲，却被用坦克支撑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布有铁丝网和地雷的围墙分割成为两个部分。这种分裂状态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目前局势的发展。那道把欧洲一分为二的围墙阻止着欧洲各个民族——它们同属一

个大陆，具有同样的欧洲文化——深入交往。

如果没有美国军队驻防欧洲，大概整个欧洲早就处在苏联的支配之下了。西欧各国之所以能依然故我，仍然是一个未被奴役的民族，仍然是一个自由的民族，那应当是美国的功劳。三十年来，美国人充当了世界宪兵。在上几个世纪里，当欧洲各国十分强盛的时候，它们也扮演过这个角色。可是，人们不大喜欢这种保护者。

## 战略上的矮子

两个超级大国的对面是些什么国家呢？有中国、有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欧洲。尽管一些研究战略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家们热切希望看到一个多极的世界，但在目前，中国、第三世界和欧洲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中国成功地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成就。它已不再因发生饥荒而饿死人，它已拥有了核武器，它在第三世界传播着一种使苏联为之不安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本身属于第三世界。但是，中国还远未具有在世界上采取战略行动所必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只具有很有限的威慑性。它在军事方面的分量，仅仅比印度或越南这样一些二等国家稍强一些。只有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才可能对俄罗斯帝国构成威胁。

从战略上讲，第三世界的意义就更小了。简单地说来，第三世界的问题是要取得发展的问题，有的甚至还要解决温饱的问题。饥饿也可能变成一种战略武器。超级大国把大量武

器运到第三世界，使它成为它们的一个竞技场。它们在那里角斗、较量，而不必冒直接对抗——包括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风险。这样，第三世界就成了它们推行间接行动战略的赌注，即战略决策者们追逐的对象。

剩下来的便是欧洲。二十世纪末的欧洲在人力资源方面要超过美国和苏联。欧洲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它是脆弱的因为它仰赖于外国：一方面它的能源和原料必须进口；另一方面，为保障欧洲经济的活力又必须出口。此外欧洲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也没有军事上的团结因此它只具有战略属性的一半。欧洲缺乏最基本的东西，即成为一支战略力量的意志。

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却是一个矮子，在战略上也是一个矮子。1945年以后又过去了三十年，欧洲仍然分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并受着它们的制约。欧洲同第三世界一样，是超级大国的一个练兵场所，一个潜在的战场。欧洲是敌对双方互相敲诈的最大赌注，但也只是个赌注而已。

面对着苏联的威胁，中国开始同美国和日本接近，一些欧洲人对此感到宽慰。但是，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我们的欧洲大陆越来越成为苏联手唯一重要的抵押品。苏联对巴尔干地区，甚至对于中亚地区感到忧心忡忡。苏联既不能征服巨大的中国，也无力与美国这个堡垒直接对抗，因此最后只有转向它唯一可以攫取的猎物：西欧。将来，如果苏联被敌手置于困境，那么它就会把攫取的东西作为迫使敌手赶快接受讨价还价的唯一手段。

## 退潮中的美国，涨潮中的苏联

从两个超级大国这一级来看，当前不稳定已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近几年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在步步后退，相反，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首屈一指的工艺技术强国，是西方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所以，它担负着西方的政治领导的责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安全，靠的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和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越南战争的溃败和水门丑闻的发生表明美国的实力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加重了这一危机：一方面，国内各种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军备费用却不断增加。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希望削减防务负担；收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减少对外国的军事援助；使美国人民的斗志涣散。因此，人们可以理解欧洲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因为欧洲人明白，在当前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安全仍然要依靠美国。

面对着削弱的美国，谁能说苏联是在走下坡路呢？虽然它在农业方面存在着困难，但西方同它的合作，使它弥补了在这方面的困难。而且，苏联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到本世纪末将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苏联的重工业具有强大的实力，在工艺技术方面也是这样。

在战略方面，苏联掌握着两张最重要的王牌：其一，它推

行一条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现在它仍然毫不掩饰地卖力地推行着；其二，它拥有一支支持它的这种政治意图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1975年以来，世界战略态势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美帝国主义处在一个退却阶段；而苏联帝国主义呢，用爱丽娜·卡艾尔·当欧丝的话来说，它“犹如涨潮之水，力图填补美国留下来的真空。”

苏联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攻势。为了对付中国，1979年1月，苏联决定通过越南这个中间人用武力侵占柬埔寨，同时又竭尽全力利用它的亚洲盟国或采取中立的国家，在前中华大帝国的周围组成一个包围圈。一个多月之后，北京作出了反应。这个反应是有力而果敢的，然而，其规模十分有限，即“教训”一下越南这个小国。结果，那个亲苏包围圈未能被打破。

在第三世界，从中东到南部非洲和马格里布，<sup>①</sup>苏联依靠它在那里的日益增强的海军力量，企图直接地或者通过古巴、捷克和东德的雇佣军，在西方的能源和原料产地取得立脚点。

至于在欧洲，苏联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上争得了对它1945年征服的领土的保证以后，现在又在想方设法获得对西欧事务的监督权。

## 谈 判 和 幻 想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反映了苏联已经取得战略上的均势。

西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总称。——译者



1972年5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确认两个超级大国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这项条约是针对中心系统的，即可以从本国领土或海上直接打击对方的核武器。同时，条约还规定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外还附有一项临时协定。考虑到美国进攻性武器在质量上的优势，协定同意在数量上给苏联以很大的照顾。

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sup>①</sup>协定缩小了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区域，并在地下核试验方面以及在会破坏环境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方面作了某些限制。考虑到苏联人在发展多弹头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即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协定重新规定了导弹数量均等的原则。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在忧虑重重的气氛中结束的。起初，苏联想通过谈判，限制美国从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个基地以及从它的航空母舰（即前沿基地系统）发射导弹的攻击能力。但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技术，于是这些新技术便成了谈判的目标：苏联人反对美国发展巡航导弹和把这项技术转让给美国的欧洲盟国；美国人则想大幅度地压低多弹头导弹的最高限额，因为苏联新式的陆基导弹命中精度很高，威力也很大，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民兵”式导弹的发射井，以致进一步威胁到美国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此外，美国人还想限制苏联部署的“逆火式”轰炸机。它虽是一种中程轰炸机，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美国的领土。

不管怎么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利于苏联人继续改进其现有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sup>①</sup>，增强其针对美国“民兵”式导弹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这样，将来美国就没有其它办法予以对付，只好进行可能包括袭击城市的大规模报复。这样的结果，双方相互使用核武器交火，并必将迅速走向极端，进而导致核自杀行动，最后共同毁灭。如果美国——它不大愿意为欧洲而牺牲自己——在欧洲采取撒手不管的态度，那么苏联人就能取得他们所希望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即拆散西方联盟，也就是说，使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与欧洲大陆的安全脱离关系。

为了对付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力量的优势，大西洋联盟将其战略建立在实施逐步升级反应上以及使用战术和战区中程核武器的基点上。今后，对于美国来说，问题是当发生第二次或第三次打击时，如何使欧洲大陆上的升级行动不至于导致美国领土上的陆基导弹发射并被摧毁。如果苏联人想毫无风险地用武力征服欧洲，那么他们必须要取得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拔除目前能防止欧洲遭受任何侵略的美国核保护伞。

人们不禁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1978年3月美国关于推迟生产中子弹的决定。中子弹可以极大地增强西方联盟在欧洲的逐步升级反应战略的效能。苏联人的抗议声明以及他们的宣传机器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受中子弹而开展的毒化宣传运动，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中期之内，在八十年代，美国

即一枚导弹的弹头，装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装置。

② “民兵”式导弹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导弹。

战略威慑力量同欧洲大陆脱钩的前景是欧洲人考虑自身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发生动摇，而且这种态度将越来越明显。但人们不能因此对他们怀恨在心，因为，在核时代，独立是不能分享的。统一的欧洲也不再需要谁来分享它的独立。

既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已经达成，那么，第三阶段会谈就应当讨论中程战略武器系统，即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和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组成的前沿基地系统以及苏联以 SS-20 导弹和逆火式超音速轰炸机为代表的“欧洲战略”武器系统。谈判将使苏联人有进一步的机会来使美国的战略武器与欧洲大陆脱钩，因为把欧洲安全的保障降低到双方中程核武器的均势基础上，就能最终取消美国远程核武器的保护伞。不管法国或英国是否同意，它们的打击力量也将被牵涉到未来的谈判中去。

苏联人就这样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坚持不懈地追求他们的外交一战略目标：使美国脱离欧洲防务关系。他们即将达到这个目标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开始，就出现了美国人限制向他们的欧洲盟国转让原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考虑，欧洲的当政人物那时大概就已经想到过上述这个问题了。1979年1月初，瓜特罗普四国最高级会谈提到了举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景，从而证实美国的核武器将从欧洲逐步撤出。这大概不会使欧洲人感到放心。如果没有一种新的西欧安全结构来填补由此而造成的空白，那么美国核武器撤出西欧将是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共同均衡裁减驻欧军事力量的维也纳谈判是东西方外

交一战略较量的另一个场所。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这一会谈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在西方盟国看来，谈判必须导致两个阵营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平衡，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裁减东方的力量。而在苏联人看来，则是要按照同等的比例裁减双方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要维持目前有利于东方的力量的不平衡状况。

西方国家是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的倡导者，它们本来想通过采取这一主动行动来抵销苏联人关于召开赫尔辛基会议的主动行动。但是，西方国家却没有抓住主动权。通过中欧裁军谈判，苏联人可以达到他们的另一个目标，即在中欧地区实现非军事化，这就等于要使德国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德国是唯一有能力在常规力量方面与苏联抗衡的强国。

苏联人可以提出建议，把他们驻在中欧的部分或全部军队撤回到自己的边界一侧，而美国的同等数量的驻军也要相应这样作，这就意味着要美国军队撤回大西洋彼岸。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在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莱茵河，而美国则必需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足够数量的军队运回到欧洲。美苏两国在地理条件上是不相等的，所以，如果中欧的均衡裁军谈判在目前条件下达成协议，那就会在非军事化的掩盖下，向欧洲的心脏地区注入一个引起不稳定的严重因素。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理解法国为什么拒绝参加这样的谈判。

最令人不安的后果并不在此，而在于欧洲盟国驻德国的军队，包括法国的第二军在内必须撤走。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势必会使欧洲各国失去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也就是说，使欧洲丧失任何保持独立的可能。

西欧最终将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四分五裂的地区，而这只能对苏联帝国主义有利。这样，苏联就实现了使西欧芬兰化的目标。

东西方之间另一个谈判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即欧安会。1975年8月1日，苏联在赫尔辛基取得了自雅尔塔协定以来最大的外交和战略上的胜利，即维持它在欧洲的现状。

西方通过协议承认了苏联对中欧和东欧三十年来的军事占领的合法性，还从法律上承认了苏联军队在1945年攫取的领土。从此以后，任何想改变苏联这种占领的意图，都将使西欧人背上不遵守协议的坏名声。

苏联没有放弃它的任何一个政治和战略目标；苏联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的控制；面对西方，苏联及其华沙条约卫星国不断增强它们的进攻性武装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在七十年代的前五年中苏联围绕着“缓和”这个口号进行了蛊惑人心的心理战，从而在西方公众舆论中，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涣散斗志、催人偷安的气氛。”

因此，1975年7月30日，雷蒙·阿隆完全有理由这样写道：“东欧的命运已经定了，今后两个欧洲争夺中的历史性赌注乃是西欧的命运。”

欧安会“续会”于1977—1978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的最后文件表明这次会议事实上是失败了。不管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活动多么频繁，苏联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庞然大物并未被动摇。苏联人在赫尔辛基取得了他们为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战役所需要的东西：“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他们有权封锁自己的边界免受西方的影响相反“；人员自由往来和思想自

由交流”的原则，却使他们能够通过西欧各国共产党和在政治、工会或文化方面的渠道，广泛地、不受惩罚地干涉西欧各国的事务。总之，相互有来有往的原则并不存在。

正如肯尼迪所说 在苏联人看来，“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的是可以谈判的”。贝尔格莱德会议的最后文件一文不值，但它表明了战略对手之间沟通思想是相当困难的。

欧安会续会暴露了苏联在“缓和”这个外交口号掩盖下所玩弄的一套骗局。1975年12月24日，也就是达成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不到半年，《消息报》就提到“缓和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维持世界的现状。”那么，西方人所珍视的稳定将会如何呢？难道缓和仅仅是苏联帝国主义用以制造动乱的一种战术手段吗？

## 若要和平……

在回顾这些主要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1978年5月25日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纽约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全面裁军的方案，其内容超过了目前的那些军备控制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但是，面对欧洲不稳定的前景，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它与组织欧洲安全结构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这方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些含糊不清，而且背离常理的事情。

正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所指出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规模，实际上是战争时期的军备规模，而不是和平时期的规模。”但是 反常的是 三十年来 正是依靠这种超级军

备的均势，和平才得以维持。

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于战略武器的会谈，事实上只是讨论限制军备问题，而不是讨论真正的裁军问题。这些会谈并不禁止它们发展工艺技术，也不妨碍它们增加军事预算。

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器会谈主要讨论双方核力量的水平，而不是常规力量的水平。然而，正是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不平衡，因此，存在着战争的危险。

另外，在这些会谈中，一般地说，决定权仍然是共同主宰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掌握着，而所有区域性的国家，即欧洲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都被撇在一边。然而，这些会谈的内容却同这些国家有最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们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赌注，是目前的或潜在的战争场所。

这些会谈只限于讨论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个方面的对抗，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颠覆活动却避而不谈。基本事实是：由于目前存在着—项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和颠覆活动的总体战略，因此就必须实行全面的裁军，即不仅要裁减核武器、常规武器，而且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颠覆活动。

作为本世纪末最大的战略赌注的欧洲，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能生存下去。但是，维护和平的愿望与和平主义的超然态度——这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以及拒绝承担责任的中立主义的虚伪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在目前情况下，鼓吹和平主义和中立主义，不正是有利于企图控制欧洲的帝国主义吗？

这就是当今欧洲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欧洲必须清醒而勇敢地正视这一现实。在和平环境中维护独立，就必须

通过建立起码的军备和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来结束目前这种不平衡状态——它是一个会引起战争的因素。只有在具备这一条件后，欧洲才能在共和国总统希望实现的“真正的、全面的和有监督的裁军”这一世界性行动中起带头作用，进而促成物质和思想意识上的裁军。



## 第二章 面临威胁

从理论上给“威胁”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把战略看作是总体性的，那么，凡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想背道而驰的，凡是影响到这个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的，都构成了威胁。因此，威胁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也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外交的、文化的或人口方面的。在总体战略范围内，威胁既可以来自外部，也可能出自内部，可施加于它所针对的目标——一个社会的一切活动和存在方式。

这里所说的威胁，并不是指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谈到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威胁，那么美国的威胁大概要远远地超过苏联，但是这种威胁并不涉及西欧及其社会和居民本身的实际存在。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威胁，是指关系到西方国家及其社会形态和自由能否存在下去的那种威胁。

如果西方制定了一项进攻性的战略，那么，威胁这个问题就不会有这么尖锐。但是，西方、欧洲和法国的战略都是防御性的。为了使防御战略能在公众面前站得住脚，就必须让公众觉察到、感觉到、认识到并识别出潜在的战略对手，并懂得防御战略的目标是保卫某种东西，使其免受别人的侵犯。

鉴于暴力行为在第三世界，乃至在欧洲日益猖獗，西方负责官员们越来越明确地指出了“威胁”的实质：这是来自苏联

的极权主义的威胁。现在，报刊和广播等宣传工具没有一天不报道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的暴力行为。对法国和欧洲的安全来说，来自苏联的外部威胁意味着什么呢？可以从战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受威胁的地区——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地区——的角度来看。

## 军事力量的对比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空间威胁。的确，通过苏联的空间活动，可以看出它把防务努力置于优先地位。

据西方专家们统计，苏联自 1962 年以来发射的一千颗卫星中，有七百八十二颗是军用卫星。这些军用卫星中，四百零一颗是宇宙空间照相侦察卫星，一百八十九颗是空间远距离无线电通讯军用卫星，七十一颗是空间电子情报卫星，七十一颗是空间军用实验卫星，五十颗是进攻性卫星。苏联通过定期发射的办法，这些卫星都在不断地更换着。

这么多军用卫星在“运转”，它们的任务是各种各样的日夜监视西方，而且精度极高，能把五米大的物体清楚地辨认出来；一旦发生冲突，即可摧毁对方的卫星（这种进攻性卫星的试验曾于 1971 年一度中断，但在 1976 年又重新恢复了。每年试验四次）；部署轨道炸弹：进行了十五次把假弹放置在按一条极难发现的轨道运行的卫星上试验。经过这些试验后，苏联从 1971 年起就从技术上掌握了这类轰炸系统。

参见本章后面的表格。

当然，美国人无疑仍然是具有竞争能力的。但人们对整个欧洲在空间方面的劣势感到惊讶。竟然没有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发射军用卫星。法国要到 1983 年才能发射 S.P.O. T 地面观察卫星，开始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而这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微不足道的开端。

核武器的威胁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据估计，苏联总共有八千到一万二千个核弹头。这么多的核弹头用于摧毁整个西方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欧洲就更不待说了。在运载工具方面，苏联有将近二千五百枚洲际导弹，其中有一千四百枚陆基导弹，四百五十枚潜艇发射导弹。<sup>①</sup>此外，苏联还拥有运载核弹头的新型轰炸机，即逆火式轰炸机。

所谓“欧洲战略”导弹，首先是针对欧洲人的。有六百到七百枚“欧洲战略”中程导弹一直瞄准着欧洲的军事基地、工业中心和大城市等目标。俄国人正在把这些导弹布置在可以经常移动的活动发射台上，使之在遭到西方打击时不易被摧毁。苏联的这些新式的 SS-20 导弹，标志着苏联人在导弹的命中精度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他们可以通过突然发动的第一次打击，成功地摧毁西欧的主要军事设施，或者使之处于瘫痪状态，不论它们是常规军事设施还是核设施。

欧洲只有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才能免受笼罩在它头上的核威胁。但是，美国保护欧洲的意志越来越靠不住了。当然，这方面还有法国的威慑力量，可是，它在数量上与对方的威胁力量相比，大约是一与一百之比。因此，对于核武器的均

<sup>①</sup>包括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在内，从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共有一千枚。

等权这个公认的原则，人们既可以说它有理，也可以对它表示怀疑。再说，法国的威慑力量只用于保卫法国本土，使其成为庇护所，那么欧洲将怎么办呢？

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只能保护它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即它们本国和欧洲联盟体系各国的领土。至于其它地区如第三世界、亚洲、非洲、地中海 欧洲的北翼等地区，并没有纳入受核威慑力量保护的地理范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研究苏联和更令人生畏的华沙条约集团在常规武器方面对上述各地区的威胁。正是这种威胁，在中期内，在八十年代将成为苏联帝国主义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的一张王牌。

正当西方国家在“缓和”假相的蒙骗下，大大减少它们的防务力量时，苏联人却使他们的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从 1965 到 1975 年期间，苏联的步兵师数目和战斗机数目增加了 10%—20% 它的军舰增加了 20%。这些军事力量有四分之三都部署在欧洲。

仅仅在欧洲，苏联人就部署了一百二十五个混合编制师，其中有八十五个机械化师和四十个装甲师。此外，还有八个空降师和华沙条约国组织其它成员国的大批部队：四十个步兵师，二十个坦克师。华沙条约集团目前是一支拥有六万多辆坦克和大约一万一千架战斗机的庞大力量。

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当年希特勒曾用五千辆装甲车入侵欧洲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又能使谁相信苏联今天拥有这样一支军事力量只是为了对付布拉格或波兹南的工人闹事，或者只是为了在红场上举行一年一度的军事检阅呢？

从现在起，常规力量已经成为在世界上开展战略活动的工具。幕后煽动的阶段已经过去，干涉变得越来越明目张胆。苏联把它的军事装备运送到第三世界国家，并在那里安插军事顾问。它还利用捷克、波兰和东德的专家作为它在非洲的代理人。大家都了解古巴雇佣军所起的那种微妙的作用。舰队已经成为苏联扩张势力范围的工具。它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和舰艇在各大洋到处游弋，它们距离法国和欧洲的海岸只有几百公尺，它们还在南大西洋和波斯湾活动。苏联拥有将近四百艘潜艇，其中四分之三是远洋潜艇，一百五十艘是核潜艇。凭借这支力量，它可以随时切断维持欧洲经济生存的海上通道。

如果再考虑到苏联的空运能力和它的八个空降师，那么苏联就有能力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把它的干预部队投放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现在，苏联拥有第一流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干预的能力。最近发生的事证明了它的干涉力量的有效性。

苏联还拥有一支商船队，经常被用于战略和军事目的；还有一支拥有五千多艘船只的捕渔队，经常出没在全球各个海域，起着监视的作用，必要时，这些船只还可以采取多半带有一点秘密色彩的行动。这样，苏联在海上的行动就更为加强了。

受间接行动战略掣肘的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排除人们在欧洲推行直接行动战略的可能性了，因为华沙条约国在欧洲有一百八十五个师处于临战状态。在常规力量对比方面，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在战斗师方面的比例，

几乎是三比一，坦克方面是四比一，战斗机是二比一。如对欧洲进行突然袭击，在主攻方向上苏联人可能拥有五比一到六比一的优势。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署了六十五个师，<sup>①</sup>有将近四千架飞机和一万五千辆坦克，但它们的装备型号不一。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理论也为对方搞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75年10月，米歇尔·德勃雷曾写道：“俄国入侵欧洲的能力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现实。”这种能力为俄国提供了两种可能性：最坏的可能性是使它的入侵行动取得成功，如果它必须走这一步的话；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对苏联而言），就是仅仅用入侵相威胁，仅仅利用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心理上施加影响，即能使欧洲国家妥协屈服。这就是利德尔·哈特和列宁所宣扬的那种最理想的策略。当力量不平衡时就会发生战争。苏联现领导的继承者们将来是否有这样的明智态度，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仍然不使用他们继承下来的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呢？

当苏联的重工业目前仍然还以战争时期的速度生产各种军用装备时，那么一切情况，人们都是难以预料的。

## 革命与颠覆

论述了苏联对外活动的的能力之后，再谈这种能力对西方

或者是相当于师的编制（根据1978—1979年《军事力量对比》的计算）

民主国家构成的内部威胁就不怎么困难了。这种内部威胁，就是指在不冒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的情况下施加各种压力。也就是说，在外围地区施加军事威胁和颠覆威胁，而又不冒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与此同时，在对方国土内，即在欧洲，施加颠覆威胁和政治威胁。

只有具备强大力量的国家才能推行这种总体战略。头脑清醒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 1975 年 11 月指出：“如果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没有一定程度的缓和，那么缓和本身就面临着危险。”勃列日涅夫先生似乎有意作出反应，就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国际间的缓和，丝毫不意味着放弃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斗争。”

在过去几年里，有那么多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南也门——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或通过暴动夺取了政权，并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看到这种情景，谁能对勃列日涅夫的话表示怀疑呢？不久以后，估计象毛里塔尼亚、伊朗、扎伊尔、乍得、泰国、菲律宾、北也门等国大概也要进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因为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还有人在策划这类阴谋。

苏联逐步控制第三世界的目的，既是为了孤立中国这个异端对手，也是为了攫取能源和原料资源，尤其是想切断西方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更确切地说，是要对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使之依附于它。总之，苏联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把它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苏联在第三世界搞这类“内部”活动的同时，对欧洲本身也并没有放过。象任何社会一样，欧洲国家本身会产生一些

不稳定因素，但除此以外，外部战略对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不稳定、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宁有时也并不是没有关系的。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恐怖主义、爱尔兰和巴斯克地区的颠覆活动，无论在经费上还是在武器上，都得到了某些来路不明的支援……

此外，还可以提一提苏联在心理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活动。这类活动可以说更为狡猾，更难揭露，因为思想上的勾结，毕竟可以任意乔装打扮。思想意识方面的战争是玩弄词句，要找到客观上潜在传递媒介是不难的。从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到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渗透正在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有人已提出要与他们的敌手——自由国家——分享各种决定权。

要找到颠覆活动的根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初，颠覆可能是一些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或有宗教幻觉的人搞的，但背后不一定有人在指使。同样，恐怖主义也可能具有某种自发的性质。感到自己被人撇在一边的情绪也足以使一小部分人采取暴力。这些人或者属于同一个种族，或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又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

不应该认为富裕社会内由于不可避免的不公平而引起的种种反抗的背后，总是有着颠覆这只黑手。但是可以这么说，战略对手可能通过颠覆活动和颠覆手段，利用这些紧张状态，并在它的总体战略范围内推动这种局势的发展。

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向北爱尔兰的秘密活动分子提供俄国或捷克的武器，为什么在科西嘉、巴斯克、布列塔尼等地理设炸弹的人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古巴这些国家之



间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还刚刚被揭露。这几个国家不仅向埋设炸弹的人提供津贴，而且还提供从事颠覆活动的训练营地和后方基地。鉴于直接牵涉进去总是一件尴尬的事，所以华沙条约国的颠覆阴谋自然要通过第三世界中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家来实施。通过这样改头换面的伪装，这类颠覆阴谋就更容易被某些阶层和某些国家所接受，并获得它们的支持。除了采用上述这个狡猾手段以外，华沙条约集团还利用一个由遍布全世界的革命的同谋者们组成的活动网，在这个活动网中有巴勒斯坦人、日本人、南美人等等……

然而，尽管这个活动网分布极广，在欧洲的那些组织却具有自己的引人注目的特殊性 即它们是“跨国性”组织 而不是国际性或民族性组织。欧洲的恐怖分子已经懂得，他们是在跟内部大体保持一致的西方自由社会打交道。考虑到这一点，恐怖主义分子在向西方社会进攻时，就分成独立但彼此又有联系的小组，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开展恐怖活动。施勒耶尔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此外 阿尔多·莫罗的悲剧证明，恐怖主义的目标已越出了单纯的国家范围，他们是在打击自由欧洲政府中的最薄弱者；受他们嘲弄的不仅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自由欧洲。他们的阴谋是要证明：所有西欧国家都推行的自由主义是毫无效用的。

如果欧洲的某些政府不得已作出严厉的反应，欧洲就会丧失其一致性，就会削弱其作为自由社会典范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欧洲力量的所在和团结一致的保证。颠覆分子会迫不及待地 把政府采取的维护安全的措施指责为侵犯自由（他

们已经在这样做了)，并且会策划新的阴谋，把自由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团结起来。

结果，人们就批评对某些已成为巴德集团的同谋者的律师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必须采取的某些反恐怖主义的警察措施感到愤慨，并谴责西班牙自由政府在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猖獗多年的巴斯克地区滥施淫威。

即使颠覆活动不一定是受战略对手的操纵，那它也是为极权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颠覆活动是极权帝国主义“客观上的”同谋者，因为它们选择的道路是相同的：摧毁欧洲的自由制度。

总之，尽管颠覆活动只是一小撮人搞的，但是这些人都怀有巨大的野心。由于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最终恢复了民主政治，使整个欧洲都实现了自由制度，所以，有些人就企图通过颠覆来破坏这种一致性。将来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欧洲：它能向世界提供一个人类社会的楷模；它将恢复对自身的信心和对前途的信念，并将重放光辉。而当这样一个欧洲的精神基础正在出现时，颠覆者却要摧毁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注意到，当前这个时期和整个八十年代是多么具有决定意义。在欧洲将受到总体战争最严重威胁的时刻 欧洲有千条、万条理由加强团结 共同战斗 保卫国家，夺取胜利。八十年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 经济威胁

在经济威胁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就会象通常所做的那样

对美帝国主义和多国公司发出指责。但是，切不可把政治和经济两个范畴的事情的性质搞混了。正是由于分不清是非曲直，人们竟把欧洲国家的唯一支持者美国当成了敌人，而把苏联当成了朋友。然而，正是苏联在西欧的对面，在我们这个小的大陆的心脏地带集结着大批的坦克。

美国跟日本一样，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是欧洲的竞争对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西方自由制度下，就是这样进行竞争的。但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竞争，并不从根本上威胁欧洲的自由、社会模式、多元化民主和欧洲的人道主义。美国并没有部署数以万计的坦克来威胁富饶的欧洲平原，它的洲际导弹也并没有对准着伦敦、科隆、米兰或巴黎。所以美国并不从实质上威胁欧洲人的生存。

这里所说的经济威胁是指针对整个西方的威胁，是属于战略对手的总体战略范围内的威胁。对于欧洲来说，这种经济威胁来自第三世界某些国家，不管这些国家是自己主动干的，还是象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那样，仅仅作为受那个战略对手控制和操纵的工具才这样干的。

第三世界某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对欧洲和西方富裕国家的攻势，表明在原料和能源产品方面存在着一个潜伏性的经济威胁。自从 1973 年石油危机以来，欧洲在能源和原料方面完全依赖别人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今后，仅仅为了保证欧洲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欧洲就必须作出巨大的财政努力，这样，就会向第三世界提供更多的王牌，以致使欧洲的经济更加脆弱。

因此，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这样一些中东国家因拥有大量货币而成了金融大国，它们对欧洲市场的压力会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

进口产品涨价就会减少欧洲的投资，相反却资助了第三世界正在兴起的工业。这些工业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自然资源，有熟练和廉价的劳动力，社会负担少，“石油采地使用费”增加。现在，这些工业已经开始跟欧洲企业竞争，使欧洲企业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欧洲目前向第三世界出售“技术”将加速这种演变。欧洲目前所承受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还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中期之内，欧洲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上述现象还伴随着另一种情况，即在南北对话范围之外，某些新独立的国家的领导人，对昔日的欧洲殖民国家仍然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这就使得上述现象更加令人不安。

由于苏联和它的追随者捷克、波兰、东德和古巴的煽动，这种敌对情绪就能被利用来策划形形色色的国际阴谋，以削弱整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行动能力。

这样，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就变成了耍弄阴谋手段的场所。在那里，绝大多数报复心理很强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铲除至今还留存在世界上的一切欧洲影响。

这一切行动都是利用“法律”这个武器进行的。而“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由人们随意加以解释的。第三世界中那些激进国家就利用这一手段从富裕国家的谨慎态度中捞到好处，迫使它们在各个领域承担义务；而这些义务总有一天会使西方重新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无法再捍卫其受到威胁的根本利益和最后那么一点点主权。

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诡计，就必须让西方舆论产生一种强烈的内疚情绪。欧洲以有极端自由的新闻为荣，而且具有一种充满基督教义的、自由思考的精神传统，这就促使它经常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省”所以在“法律武器”面前，欧洲简直是不堪一击。事实上，欧洲的新闻传播工具已不断为此提供了证据。

如果有一天，亚洲、黑非洲或马格里布地区的浩浩荡荡的“绿色进军队伍”向欧洲这块乐土奔袭而来，那末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肯定会在遭到入侵的欧洲人当中，找到最慷慨、最轻率的狂热拥护者。过去，野蛮人的大规模入侵结束了欧洲的罗马帝国，这与今天的情况并非没有某些相似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觊觎欧洲的那个执行总体战略的超级大国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第三世界的激进情绪来反对欧洲的利益。现在，我们知道，牵涉到这类活动中去的，不仅有古巴的雇佣军，设有训练营地的伊拉克，而且还有向形形色色的叛乱组织和恐怖主义者提供津贴的利比亚。虽然不能说，施加经济压力和搞恐怖活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联系，但至少，这两者都出于同样的考虑。

以上对各种威胁的粗略分析说明，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是互为补充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制造动乱，因为正象苏联人所宣称的那样，缓和决不等于维持现状。

## 武器的发展和工艺技术的威胁

工艺技术的发展可能是使战略态势在本世纪末发生变化

的第三个因素。工艺技术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工艺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军备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欧洲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出跟不上形势，这对欧洲国家构成了一种威胁，对于这种威胁，我们可以称其为工艺技术的威胁。

从质量角度讲，一些新的武器不断被研制出来；从数量上看，武器的装备和储存都在增加。这种变化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似乎已实现的世界军备平衡被打破了；二是，在竞争中维持住一个中等国家的地位越来越困难，而且中等国家的可信性将不断地降低。只有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统一的超级大国才能跟得上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的步伐。

在核武器方面，尽管有国际协定，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国际协定，才使军备竞赛在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军备竞赛的目标是双重性的：一是寻找“差距”，在质量上来一个飞跃，争得绝对优势，例如在反弹道导弹或者激光束武器方面就是这样；二是继续保持现有武器的可靠性。

在弹头方面继续进行着研究，以实现弹头的微型化，弹头的硬化——使它能经得住反弹道导弹的核爆炸轰击——以及用激光进行核聚变引爆，而不是核裂变引爆，等等。

在运载工具方面，射程、速度和命中精度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美国导弹命中目标的精度高，这样就可以实行施莱辛格的新理论，即在“打击城市”的报复之前，先采取“打击军事目标”的行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增加了打击军事目标的可能性。

核武器的不可摧毁性是多种因素有关的。在目前的技术状况下，潜艇可以避开一切监测；可以把地对地导弹布置在活动发射台上，采用轨道行走或轮胎行走的方式不断移动；还可以派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持续监视领空。

这样，侵略的一方就无法一下子全部摧毁对方的运载工具。不管怎么样，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受攻击的一方仍然具有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能反击侵略者的城市，使侵略者遭受重大损失。而这种损失大于侵略者追求的目标，是它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目前的威慑原则。

但是，可以这样说，工艺技术发展的方向是提高第一次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的有效性，并提高选择目标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技术发展会打破使和平局面维持了二十年的核平衡。

弹头微型化，巡航导弹投掷方便，中子武器在战场上的有效性以及这种武器并不伤害受到威胁的城市，这一切会推动人们不愿超出战术和战区阶段而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

同时，与核武器有关的其它装备也在日臻完善，如卫星、报警和监测系统以及与此有关的雷达和信息系统。

在八十年代，所有这些进步将造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象法国或英国这样一些中等国家，是否具有实现这一转折的科学能力、工业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呢？显然没有。

虽然在常规武器方面的进步还不怎么惊人，但在这方面同样也有了重大的进展。在第三世界市场的引诱力刺激下，常规军备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军备竞争既是为了实现在战略上享有霸权地位的愿望，也是出于经济上和外交上的竞争。

技术上的进步真是数不胜数，而且有些项目刚搞成不久很快就过时了。只要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够了：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已到三马赫数，战略轰炸机和运输机的飞行半径将近一万公里，装有电子设备的侦察机可进行远距离侦察，飞机的运载量越来越大。美国未来的 B-1 型轰炸机能运载五十七吨普通炸弹或者二十四枚巡航核导弹。激光制导导弹以及大面积杀伤的高爆炸弹已经在越南作过试验。卫星的侦察能力非常强，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对方的每一寸土地，从控制台的观察屏上甚至可以辨认出坦克炮口的口径。

水面军舰已开始使用核动力，潜艇在这方面已先走了一步。为保卫领空，军舰都配备了电子设备，用海对空、海对海导弹摧毁对方的飞机或舰只，射程也在不断地增加。性能良好的水下监测设备开始利用声纳、探测船身磁性和雷达脉冲等技术。这些技术手段都被安装到潜艇、水面军舰、侦察飞机和直升飞机上去。

舰只也正在实现专业化：有发射导弹的核潜艇，有承担驱逐任务的核潜艇，有战斗机航空母舰，有直升飞机航空母舰，有用于防空的导弹舰，有反潜艇的导弹舰，有登陆舰，有后勤支援船，有高速快艇，有水上直升飞机，有舰载飞机，有间谍拖网船等等。

地面装备也不甘落后，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车辆实现了机械化，并能水陆两用；直升飞机的用途在多样化，性能亦在不断地改进；红外技术、雷达和用于夜间的瞄准装置等技术也在发展；用激光捕获目标和控制发射的技术取得了进展；通讯设备、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高速远程大炮以及各种火箭发



射器也有了发展。用于战场的常规武器进步这样大，以至于某些专家对核武器的微型化是否有必要也产生了疑问。

无论常规武器在质量上的进步有多大，数量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降低。的确，单是制造一些出色的原型设备是不够的，还应当能实现生产的系列化，并且应当能用它来装备自己的所有部队。

由于中等国家财力不足，因此它们想使人认为，只要拥有几项尖端的装备就算有了可靠的防务。这显然是错误的。它们之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全面装备自己。而现代冲突的特点是军备消耗量极大，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贮存。1974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十天内就击毁了五百二十架战斗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今天法国空军所拥有的飞机数目。击毁的坦克有二千八百辆，比法国拥有的现代化坦克总数还多得多。

所以，今后的战争将是拼装备的战争，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当然首先是比装备的质量，同时也是比数量。谁拥有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装备，谁就肯定占上风。

与超级大国相比，在四分五裂的欧洲，没有任何一个中等国家今后有这样的能力。军备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要有新的解决办法，必须寻找与需要和费用相适应的机构。

1979年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对照表①

核武器	核弹头 (包括战略的和战术的)	核潜艇		战略导弹		战略轰炸机		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运载工具
		战略核潜艇	进攻性核潜艇	洲际弹道导弹	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远程	中程	
美国的总数	10,000	41	68	1,054	658	432	66	100
部署在西欧的美国核武器	7,000	31	20		320			
英国	192	4			64		48	
法国	190	4			64		37	
东欧(包括俄罗斯和高加索)	5,000	52 (北方)	57 (北方)	1,100	400	120	500	64
苏联(全部武器)	8,000②	70	80	1,400	1,015③	135	665	64

① 本表根据1978—1979年《军事力量对比》和报刊文章编制。

② 到1985年大概可达到10,000个(最低估计数)。

③ 其中大约450枚是洲际导弹。

## 1979年驻扎在欧洲的常规力量对比

(录自1978—1979年《军事力量对比》)

驻欧洲的常规力量	总兵力①	战斗机	坦克	水面军舰	常规潜艇
华沙条约组织(总兵力)	5,454,000	10,700	63,000	708	221
驻扎在俄国的欧洲部分②和欧洲的力量	4,000,000①	8,000	52,000	550	162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地区和中地中海)	3,347,000①	3,972	17,931	965	120
美国驻欧洲的武装力量	300,000③	700③	3,000	86	—
法国	504,000	643	1,060④	89	18
西欧的“中立”国	346,000 (西班牙、爱尔兰、瑞士、奥地利、瑞典)	1,050	2,624	179	28

① 包括实际上能作战的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力量(例如边防军、警察等)。

② 包括乌拉尔和高加索,还包括北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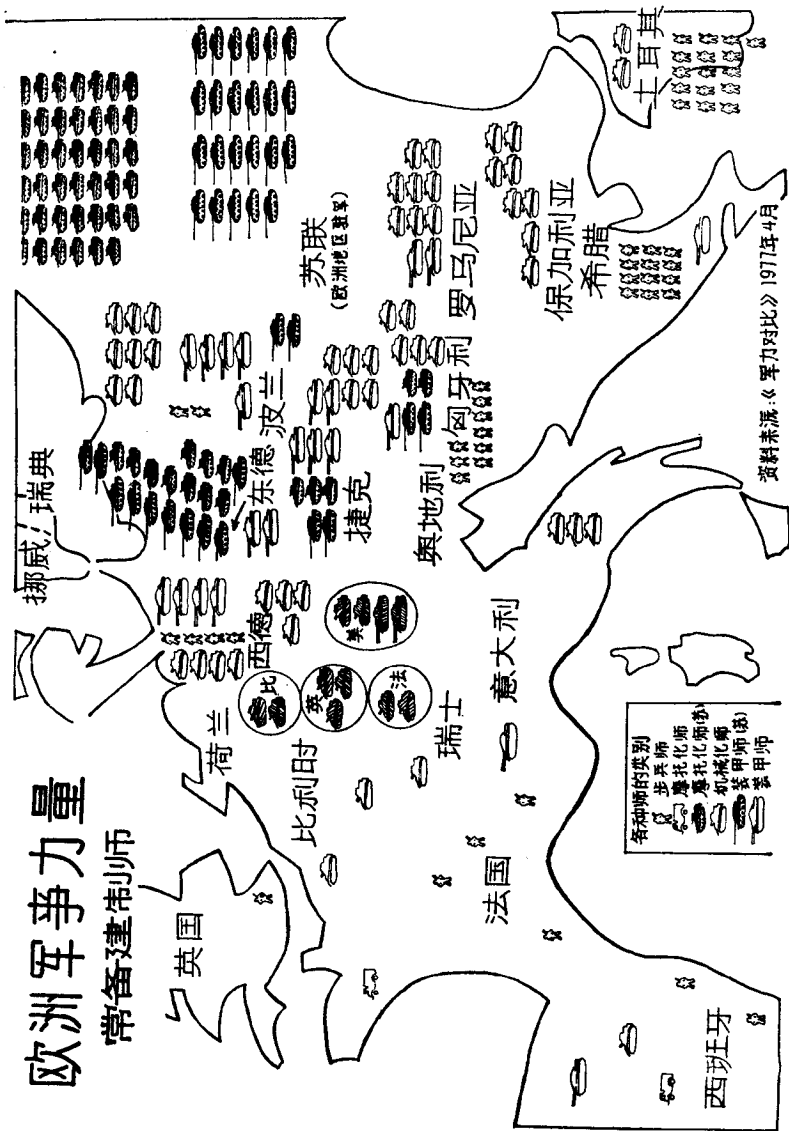
③ 包括第六舰队。

④ 不包括1,100架过时的AMX-13。

北 欧 和 中 欧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南 欧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坦 克	21,100	坦 克	7,000	6,800
总 兵 力	943,000	总 兵 力	626,000	388,000
战 斗 机	4,055	战 斗 机	2,375	1,645
北 欧 和 中 欧	军 力 对 比	南 欧	军 力 对 比	军 力 对 比
坦 克	3	坦 克	1	1.6
师	2.3	师	1	0.9
战 斗 机	1.7	战 斗 机	1	1.7

# 欧洲军争力量

## 常备建制师



资料来源:《军力对比》1977年4月

### 第三章 二十世纪末的战略

在这二十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和他们的欧洲邻居一样，渴望能有更大的安全。在威胁越来越严重地笼罩着这个小小的西欧半岛时，欧洲人民意识到自身的双重脆弱性，即消费社会的物质福利的脆弱性和多元化民主自由制度的脆弱性。

然而，这种对安全的需要，人们还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含糊地提出来，而且论据也是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欧各国都没有自己的战略。法国大概是个例外，可是，法国的战略又受到本国力量的限制。

西方战略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无政府状态和虚弱无力。说它无政府状态，是因为被分割成一块块弹丸之地的西欧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常常是竞争的，有时是冲突的；说它虚弱无力，是因为分裂妨碍了行动。在过去三十年中，肩负西方防务重担的美国，今天在不危及它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对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显得踌躇不定。

面对这一真空，极权主义就在各地，尤其是在自由国家周围及内部推行其战略。这种战略的长处是有一个全球的、合理的、统一的构思。它不是冒险主义的，它只是毫不掩饰地按照其前后一致的逻辑进行部署。

东方对付西方有一张重要的王牌：它具有一个战略，一个战略意志，一个战略目标，通过消灭多元化民主，夺取共产主

义在世界的胜利。

不是胜利就是消灭，舍此别无抉择。为了不被消灭，就必须有一个确定目标的战略和一条“政治”路线。这个战略必须是简单明确的，并且要符合现实主义这个主导思想。

下列七条准则<sup>①</sup>可以构成在本世纪末之前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最理想的中期战略。这个时期，欧洲联盟行将建立，但其它方面的情况尚难预料。如果人们希望欧洲真正独立，那么，这个战略就是合乎愿望的目标。

这七条准则是：

- 一、只有总体战略才是有效的战略。
- 二、总体战略必须由最高领导人，即确定战略敌人的政治领导人来推行。
- 三、战略的目标是摧毁敌方的意志。
- 四、间接行动战略是当前和近期的战略。
- 五、间接行动战略意味着应拥有采取直接行动的威慑战略，并且不排除转而采取直接行动战略。
- 六、在和平时期积极准备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 七、任何单纯防御战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一条准则：只有总体战略才是有效的战略。

确认这一观点是现代任何战略的基础，因为它完全反映了事实。然而，这一条准则，只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在切实地

<sup>①</sup>多利中校在其《法国的欧洲战略》一书中，（梅迪亚出版社出版——1977年）详尽阐述了这七条准则。

执行它。根据这条准则引出了下列两个后果：

——和平概念消失了：人们不再尊重 1939 年以前盛行于欧洲的战争法规。战争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其目的是歼灭敌人，或者将其战败，然后再予以彻底改造。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身穿军装的战士和手执武器的民兵之间，不再存在什么区别。

在总体战略当中，战争与和平之间有着同一性。不单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和平也是战争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略是总体的，因为它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适用于有组织的社会和国家的一切活动。所谓总体战略是由各种不同的“一般”战略构成的 政治战略、精神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技术战略等等。军事战略与上述各种各样的战略一样，是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而上述那些非军事战略，却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使用的。

在军事战略方面，总体战略这个概念意味着不存在陷入绝境。它必须拥有各种必要的手段，以对付各种可能的威胁，诸如核威胁、常规武器威胁、颠覆活动等。总体战略要求在军事战略方面既要有威慑能力，又要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第二条准则：总体战略必须由最高级领导人，即确定战略敌人的政治领导人来推行。

这是第一条准则的逻辑延伸。如果总体战略不是军事的，



而军事战略只不过是总体战略的诸因素之一，那么很明显，最重要的战略就是制订战略整体的那一级，因为它掌握着构成总体战略的全部因素。制订战略整体的就是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由此，就产生了军事权力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家和军人之间必须具有的紧密联系。

不预先确定政治目标，就不会有什么战略。缺乏协调一致的、明确而肯定的政治目标是西方战略虚弱无力的原因所在，姑且不说它没有什么战略。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战略，就必须有一个不存偏见的、理智的政治领导集团。

总之，是政治领导人确定战略上的敌人。但要西方人承认敌人这个概念，确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是最起码的一步，因为不确定敌人，战略就无从谈起。特别是，如果说不说要防备谁，那么怎样说明西方的防御战略是正确的呢？相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却使敌人这个概念产生了一股巨大力量。

### 第三条准则：战略的目标是摧毁敌方的意志。

博弗尔将军给“战略”一词下的定义是：“运用武力解决冲突的双方相互考验的这种意志的辩证艺术”。因此，战略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心理因素对争取胜利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当然建立在博弗尔将军所说的“劝阻战略”之上。劝阻战略是通过气馁、反对和恐惧这三种心理机能发挥作用的。

安德烈·博弗尔(1902—1975)法国上将军事论著主要有：《威慑和战略》(1965年)、《明天的战略》(1973年)、《危机和战争》(1974年)等。——译者

战争旷日持久会造成气馁；毛泽东据此确立了他所十分重视的疲劳战术。由于下述两方面的因素，使得这种疲劳战的效果就更大了，即不给敌手以任何妥协的希望；使敌手感到其事业是非正义的。在这方面，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越南，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种心理机能是反对情绪。应不断制造反对敌手要进行的战争的情绪。劝阻战略利用的这种反对情绪有两个方面：国际公众舆论的反对和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对。为反对美国干涉越南，人们在世界上和美国人民当中进行了反战宣传活动，这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

恐惧是劝阻战略利用的第三种心理机能。它是利用潜在威胁对敌手的意志施加种种压力。1956年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干涉，就是在苏联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面前却步的。

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一场冲突，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心理战的特色，这实际上是迫使敌手在精神上投降。

第四条准则：间接行动战略是当前和近期的战略。

间接行动战略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因为直接行动战略，不论是用核武器还是用常规武器，似乎都由于核威慑理论的出现而变得难以执行。当前，行动战略有以下四种形式：有限战争、革命战争、颠覆战争和制造危机。

有限战争介于直接行动战略和间接行动战略之间。它处于常规战争一级，但低于核战争。从地理范围上看，有限战争局限在不触及核大国切身利益的外围地区。在战争强度上，

有限战争也有一定的限度，“以免上升到极端，因为极端就是核战争。”

有限战争受到总体战略的一切非军事因素的限制：心理上的劝阻；呼吁超级大国用核威慑阻止战争升级，并阻止它们本身以采取行动相威胁或甚至竟然采取行动。有限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皆属此例。

革命战争介于颠覆战争和有限常规战争之间，它以颠覆战争开始，而以有限常规战争告终。越南战争就是一例。革命战争的目标首先是政治上的，即夺取政权，同时也是精神上的，使敌手在斗争面前却步。最近的越南战争是一个具有全过程的革命战争的最引人注目的典范。它从开始到结束共用了三十年时间。

博弗尔将军归纳了革命战争的四种手段：恐怖主义；宣传鼓动；组织民众；游击战争。前三种是革命战争和颠覆战争所共有的，第四种是革命战争的特点。

武元甲将军认为，革命战争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人民的战争；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战争；有长期抵抗的可能性。根据这样的定义，游击战是存在于交通不便地区的农村穷苦民众的策略。

除非将来出现新的情况，革命战争对工业国家生活富裕的人民似乎是不适用的。相反，它在第三世界却特别适用，在非洲正在发生的冲突就是明证。

至于颠覆战争，把它用到现在西方世界，真是非常合适。颠覆战争是在富国进行的战争，是在北半球的富裕之邦，即白人世界进行的战争。但这并不排斥在第三世界的穷国也会发

生这种战争。对颠覆战争，无人能够幸免。

颠覆战争进一步发展了心理手段和政治手段，因为它把军事手段、武力行动减低到最低限度。搞颠覆战争的人，力求通过军事以外的其他手段，特别是心理手段制造混乱，从敌方手中夺取政权，用他们为之奋斗的那种社会政治制度取而代之。

应当承认，目前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搞颠覆战争。面对这种战争，四分五裂的西方国家却各自为政，穷于应付，毫无战略观念。

间接行动战略的最后一种形式是制造危机，它是最不容易发现的。危机在开始的时候和人们错误地称之为和平时期的形势几乎没什么区别。而当危机发展到顶点，只要动用武力，就会进入革命战争阶段或有限的常规冲突阶段。

从战略方面讲，危机属于国与国对抗这个范畴。它是国与国之间潜伏的紧张关系的集中反映，并有导致诉诸武力的危险。1962年的古巴危机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例证。

有关危机的第一个要素是美国人所说的“对危机的处理”。所谓“对危机的处理”既含有指导的意思，也含有控制的意思。在我们这个充满冷战、热战或凉战的年代，危机是一种潜伏现象，中东、非洲、印度洋地区等均属这种情况。因此，“控制”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要控制就必须要有“预见”。而预见的基础是国家应具有通过情报机构和空间侦察及窃听手段及时了解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能力。情报必须及时发出。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超级大国才具备这样的手段。

为了指导危机，作为战略家的国家元首（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收到情报），必须有一个由多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班子，为他分析综合情报，协助他作出必要的决策。因此，有关危机的第二个要素是由指导危机所必不可少的通讯系统构成的。国家元首必须分秒不误地知道现场发生的一切大小事件。遍布世界的通讯网必须确保国家元首的指挥畅通无阻，从战术阶段的实际指挥，到战略阶段的发起核反击（如果敌方使用其第一次打击力量的话）。同时，这个通讯网还要能使国家元首通过热线同敌方决策人进行必要的对话，以有利于进行谈判，避免公开发生冲突。

最后，如果没有采取行动所必需的军事手段，保证事先下定的决心能够兑现，那么介入危机的处理过程就是不可能的。除常备的核威慑力量以外，还必须拥有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必须是强有力的，能够出师报捷；同时必须是高度机动的，能够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投入危机地区。

目前，显然只有超级大国才拥有这样的财政和工业能力，具备应付危机的行动战略所必需的各种武装手段。要实际指导一场世界规模的危机，包括法国在内的中等国家是鞭长莫及的。大国地位是不得分享的，而分裂的欧洲却还在做这种令人痛心的尝试。

第五条准则：间接行动战略意味着应拥有采取直接行动的威慑战略，并且不排除转而采取直接行动战略。

如果没有威慑能力 特别是核威慑能力 那末即使想要实

施间接行动战略也办不到。与那些威慑专家和学者们宣传的相反，威慑不单是热核的，因为对于敌方的总体战略，也就是说把热核的、常规的和颠覆的手段集合于一体的战略，只能用同样的总体威慑战略与之对抗。

可是，核武器的出现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使战争这个概念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在不考虑核武器的情况下制订任何什么战略。

这种威慑必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它必须以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为基础，同时人民要有实施这种战略的决心，甚至必要时宁肯毁灭也不甘愿束手就擒。

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以来的一切常规战略都很简单，即只要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集中兵力。但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之复杂化了。一方面，核武器的破坏力大，另一方面，目前还无法对它加以防备，这两种情况迫使人们不去动用这种武器。这是相互威慑的原则，即恐怖平衡。当然，这个原则只适用于拥有核反击能力的超级大国之间最高一级的直接战略。它适用于超级大国，因为它们的核威慑手段不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下被摧毁。侵略者的这种打击必然是突然袭击的，而且相当有效，这样做的目的便是想阻止对方反击到自己的领土上来。

但是，由于战略核对抗招致的风险非同小可，所以核威慑只用于对付核武器，而且也只是用来保护核武器拥有国自己的国土，即它们自己的“庇护所”使之免遭核武器的打击。因此，战略核武器并不能保护其它地区免受核威胁，因为只有战略核武器拥有国自己的国土才是核威慑要保护的切身利益；

它更不能对付用常规武器发动的侵略，因为在常规战争阶段，不可能考虑冒这样的风险：一下子把冲突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战区和战术核武器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一般认为，对于拥有核武器但在常规武器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战术核武器能弥补这方面的劣势，是阻止战争升级的一个新的障碍。人们希望在表明必要时将打到底的决心的同时，能够用战术核武器有力制止对手的军事行动，以便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灵活反应战略”，也是法国使用冥王星导弹的理论。这就摆脱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种愚蠢荒谬的孤注一掷的概念。当然，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在最初阶段不得不采用上述这样的概念。

在未来二十年中，威慑理论遇到的麻烦是核扩散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而这只会削弱目前核大国领导人的理性和明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核武器微型化，这将使核武器变得与威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常规炸弹差不多。

核武器威慑能力的减小会使核大国越来越倾向于在进攻中使用它，使用的地区将是外围战场，如沙漠国家或海洋水域，因为在外围战场使用，战斗对外部造成的后果最小。这样，到将来，使用战区和战术核武器就不再是什么神圣不可动弹的事情了。而现在，使用这类核武器依然是同从战略上保护自身的利益和保卫本国的神圣领土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今后的年代里，核武器不再具有目前这样大的威慑能力，因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会增长，同时使用常规

力量的可能性也同样会增长，比如在欧洲。

因此，西方必须建设一支比目前这支平庸的力量大得多的常规力量。威慑力量的可靠性的降低，将有可能通过加强常规力量来弥补。东方集团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已经非常及时地这样做了，而在同一个时期，西方却被缓和蒙蔽得不辨东西南北，减少了自己本来就很微弱的防务努力。

由此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不平衡，证明了第五条准则是正确的。这样，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接行动战略第一次在欧洲变成了实际可行的战略，其实施手段是，通过威胁对人们产生心理上的效果，或者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第六条准则 在和平时期积极准备 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下一次大战将是货真价实的突然袭击。但这并不是说，一场军事攻势的迹象不会被发现，而只是说，那些看出征候的人不会为人们所相信。上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的突然袭击 既可以是外交的 科学的 经济的 政治的 技术的 也可以是军事的。

在总体战略的范围内，突然袭击也是总体性的。必须能够突然袭击敌方 但与此同时 又必须全面戒备 常备不懈 以免遭到敌方的突然袭击。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准备，即所谓“和平”时期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随时准备投入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苏联人希望赢得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他们正在为此而努力，但是，他们也在为打一场长期战争做准备。西方战略家们盲目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硬是认为今后



战争只会打几天。这样，他们大概就无须为战争进行准备了。

在军事方面，备战主要是指常规力量，因为威慑平衡从原则上排除了使用核力量的必要性。核力量应当保持在应有的水平上，并且处于戒备状态。常规力量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准备：一是在尚未达到动用核武器这一界限之前，准备在欧洲打常规战争；二是准备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实施行动战略，从而确保欧洲人的安全。

经济方面的准备同样是重要的。从平时时期起，就必须准备必要数量的装备和物资，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必须有足够的贮存，能支持一场持续数月的激烈冲突，并能经得起一连几个月的物资供应受阻。民用工业也必须随时准备转入临战状态。要害设施应当疏散和转入地下，以减少受损失的可能。

最后，民众的准备大概是最重要的。因为民众是现代战争的关键因素。必须组织民众，使他们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要保护他们。组织民防在东方国家占有不容置辩的优先地位，但西方国家对此却漠不关心。必须使人民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拿起武器马上投入战斗，反对敌人的侵略和奴役。在这方面，只有共产主义国家在进行这种努力。

最后，还有民众的政治准备和精神准备。这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总体战略要争取的目标是，从平时时期开始，通过颠覆战争削弱敌方的防御思想。使民众有精神准备，国民教育和新闻宣传应起作用。然而为了从思想上动员人民，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在做些什么呢？

第七条准则：任何单纯防御战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能把安全建立在防御性的与和平主义观念上。在1935年到1940年，当时法国的消极观念，导致了1940年5月的大溃败。由于这种观念使法国不能及时挫败希特勒精心策划的冒险主义。法国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这就给纳粹帝国主义帮了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可以说，法国甚至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被打败了，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尤其是从精神上被打败了。

“防御”这个术语不再符合总体战略的实际，因为它的目标似乎是局限于自己的领土疆域之内，可是今天，切断中东的石油供应和停止非洲的矿石供应，都能危及雷诺工厂工人利益。同时，“防御”这个术语的目标似乎是局限于一种形式的战斗，即反对外部敌人，可是今天，一次暴动性的罢工同空袭首都一样，也能使法国处于瘫痪状态。总之，“防御”这个词是与坐等挨打的消极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从精神上讲，防御会给患消极症的人带来惩罚。

所以，战略家们今后宁愿用“安全”这个术语，因为它既适用于来自远方的威胁，也适用于内部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包含一些进攻性的防御行动，如法国近几年在非洲所采取的行动。

应该采取什么级别的攻势呢？肯定是在战役和战术一级。因为，如果常规战争已经开始，那么要赢得战争，就只有一个办法：勇往直前。防御行动只能是攻势的前奏。

从战略观点上看，赢得战争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尽快把

战斗推进到敌人的国土上。过去是这样，将来仍然是这样。按照希特勒时代德国人的说法，就是列队行进在巴黎街头。今天的俄国人深知这一点，在他们的作战地图上，箭头一直指到了布雷斯特和波尔多。任何战略的最终行动都只能是进攻。

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必须竭尽全力加以制止，必须保持强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战争一旦发生了，那就必须夺取胜利，否则，就只好接受败局。

当然，赢得战争是以实力为前提的。但是，也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即进攻性的精神状态。乍一听，这似乎违背常理，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为了和平，确切地说，为了维持“非战状态”必须这样做。

上面阐述的这几条战略原则，当然只有大国才有能力可以全部实行。过去，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这些欧洲强国都曾经实行过。如今这些国家只是一些中等国家了。它们现在缺乏政治意志。它们将永远不会具有推行总体战略的能力。当今，在世界范围推行总体战略的只有美国和苏联。

其他国家，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或者奉行大西洋主义，或者甘愿作苏联的卫星国，或者标榜中立主义，而中立主义只是变相地依附于莫斯科。

实施总体战略已经超越了四分五裂的欧洲的中等国家的能力。对欧洲国家来说，应当改变保障安全的办法，即应由欧洲自己来确保欧洲国家自身的安全。

## 第四章 法国人的真正安全

法国要保障它所希望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安全，单靠它自身的有限力量已经是不够的。

法国人的真正安全今后必须通过欧洲的联合来实现。它将取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愿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建立一个具有推行总体战略能力的新的安全结构。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教育、政治方面进行努力，一般都必须有一个中期计划——十五年的计划。战略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经过十五年殖民战争以后，防务政策的方向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于六十年代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十年期间，它转向了一种新的概念：威慑概念。这种防务政策方面的威慑概念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独立概念结合成为一体。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正好十五年之后，从 1975 年开始，人们又对这种双重概念提出了疑问。

当前，战略思想正在孕育着新的演变。七十年代末标志着旧的战略思想开始向新的战略思想转化。这就要求必须及时了解今后将会出现的情况，并为此规定行动的方向。那末，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十五年至二十年之内的战略，即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战略将是什么呢？

对中等国家来说，威慑战略如果不伴之以行动战略，就可

能变成中立和消极的象征。民族独立，如果不在创造性的互相依存和团结中得到实现，就可能变成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实际上还得依附于别人。安全概念的范畴正在发生变化。

今后，没有核武器及其提供的威慑能力，就无独立可言。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掌握核武器——早在第四共和国末期就已开始着手研制——成了戴高乐将军执政时期的一大建树。没有核武器，法国就不可能在 1966 年退出大西洋联盟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法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备受羞辱、并在战后向人伸手要东西的国家，才恢复了自己的骄傲和独立。

六十年代法国的核威慑理论家加卢瓦将军曾把核武器恰当地称作“穷人的武器”。当时的法国，仍然被非殖民化运动纠缠着，不象后来那样富裕。十五年当中，常规力量为建立我们的核武器系统付出了代价。对我们来说，核武器曾经是“穷人的武器”因为我们当时是贫穷的，然而直到最近几年，它仍然使我们的防务预算负担了过重的开支。可是，为独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党再会怀疑，戴高乐将军为法国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否是正确的。

掌握核武器还产生了一些技术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影响。技术方面的影响有哪些呢？法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上得益非浅，以致在某些应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我国很想依靠它来减少能源上的依赖性，与此同时，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空间能力，首先是在火箭方面，接着是在卫星方面。

从外交方面来看，拥有核武器使法国和其它核大国美国、

苏联、英国和中国一样，进入了能左右世界战略的国家之列。要是没有自己的核能力，我国将沦为一个三等国家，对此切不可抱什么幻想。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核能力，我们的代表才在国际会议上受到尊重。即使我国政府拒绝参加某些东西方谈判，但是在外国谈判者的心目中，仍然存在着我国独立的战略核力量。法国的份量与英国或德国比较是截然不同的。

从地区角度来讲，核能力使我国几任国家元首在非洲和地中海地区加强干预的意志，并具有特有的权威。

在法国同美国或同苏联的双边关系中，无疑，法国的威慑能力给法国几任国家元首提供了独立和自由作出决定的可能。法国能和盟友美国保持着多疑的关系，我国还能和苏联——博弗尔将军称它为“大陆上的捣乱分子”——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因此，在这个行将结束的时期中，核威慑和民族独立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主要目标贯穿着。于 1958 年上台执政的戴高乐将军给法国确定了独立这个目标。凭借着建立起来的威慑战略，人们可以说，这个诺言已经履行了。

## 威慑战略的局限性

那么，为什么要对这种威慑理论提出疑义呢？为什么现在就要这样做呢？理由是多方面的。

在进行这种批评性的研究之前，首先应当明确指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过去的延续性，而不是要和过去一刀两断。

有人想把在六十年代阐明的学说，原封不动地搬到本世纪末，充当保护这种学说的冥顽不化的卫道士，变成被某种学说吓呆的善男信女，危害之大，莫过于此了。地球在转动，人类在变化，技术在发展，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当现实已经变化的时候，有人却对某些一时的想法恋恋不舍，硬要维护过去某种一成不变的战略学说，这显然是不堪设想的。如果那样做的话，只能使这种学说变成陈腐过时的谬论，从而使我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在战略上，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现实主义。

凡是与戴高乐将军接近的人都指出，他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而不是个拘泥于理论的人。他一向关心的是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于实际的事件和客观的事实。所以，他是一位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人。还是让我们不要背离他吧。不要把我们的战略禁锢在某一个阶段，而应该要学会进步。否则，我们就可能还是用堑壕战去对付装甲之旅；或者躲在虚假的核马其诺防线后面，而敌人却想方设法绕过这条防线，用不着造成什么“世界末日”而列队行进在巴黎街头。我们还是不要去做那种法利赛人吧。在战略方面，难道我们能不相机改变战略思想，而每隔半个世纪就给自己造成一次1940年5月那样的灾难吗？

现在，实际情况怎样？战略发展变化的理由何在？

一个中等国家的威慑能力是有其局限性的，首先是报警系统方面的局限性。法国的威慑力量是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报警系统，即戴高乐将军坚持要法国使用的一种新型报

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成员，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译者

警网。一旦发生突然袭击，这种报警网便可给我们的决策人提供几分钟宝贵的预报时间。这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几分钟，但却是生死攸关的。

到八十年代，法国准备发射军事卫星，这将完全是本国自己的报警系统的开端。但是应该指出，这一装置再加上建立一个地面处理中心和定期更新卫星，费用将是很大的，五年之内估计需二十亿法郎。同样，要实现雷达监视计划，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我们宁愿使用这种雷达监视系统，而不喜欢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载预警与指挥系统。

另外，苏联人似乎在高能粒子束方面相当先进，它能在空间把卫星摧毁。

威慑战略的第二个局限性是，它只能对付同一级的威胁，即核武器一级的威胁，却不能阻止较低级的威胁；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种威胁在日益发展。在外围地区的危机（如法国以联合国名义介入的黎巴嫩危机）和国内危机（如1968年5月的危机），核武器是根本用不上的。六十年代的威慑理论家除博弗尔将军之外，对此都只字未提。

威慑力量为行动战略提供了行动的自由。这就是说，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赫鲁晓夫用核威胁迫使法、英罢手的情况现在再也不可能发生了。当时，法国还没有核武器。今后，我们在非洲的干预则有我们的威慑力量作后盾。

自从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经受了创伤的美国，对担当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显得犹豫不决，法国难道不是在非洲实施行动战略的唯一欧洲国家吗？难道它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西方国家吗？



法国干预力量的地面部队虽然受过出色的培养和训练，但是论装备，他们并不总是能与它对阵的叛乱者相匹敌，他们没有装甲部队和炮兵的有效支援，而当冲突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这种支援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在扎伊尔的沙巴事件中，如果不请求盟国力量的帮助，我们的空军就无力把部队运到出事地点。在空中截击和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我国飞机的性能是良好的。但是，如果必须在海外战场上进行有力的空中干预，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战术空军的行动能力在欧洲尚且严重不足，如到海外战场作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

专家们都在谈论海军的困难。我们的海军由于优先发展远洋战略力量而负债累累，如不采取措施，几年之后其总吨位将只有一艘巨型油轮吨位的一半。目前，我们的舰队在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大西洋和地中海游弋炫耀，但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毫无后备力量。我们的重要利益在哪里受到威胁，悬挂我国国旗的舰队就应当出现在哪里。可是，我们的利益如果真的受到实力可能比我们雄厚的国家的海军的威胁，我们在海上的舰只能够取胜吗？

正是在这种具体背景下，提出了法国独立这个问题。目前，潜在敌人的间接战略正在威胁着全球，特别是非洲大陆。这块大陆需要我们的支持，而它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又是我国的经济须臾不可缺少的。我国各个企业的活动，我国工资领取者享受的社会进步，极言之，法国公民的自由，是与第三世界，特别是与非洲和中东息息相关的。1978年6月22日，共和国总统在谈到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时说：“欧洲和非洲的命运

休戚与共，这有着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和历史上的原因。”<sup>①</sup>1978年5月19日雅克·希拉克在《世界报》上写道：“在我看来，欧非对话首先是欧洲独立和非洲独立最可靠的保证之一。”1978年4月3日，三军参谋长在国防高级研究所宣称：“法国的安全与非洲的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行动战略来保卫民族独立的“重大”利益，就不可能有独立。但真正限制独立的是工艺水平和财政能力。不论是在核子物理方面还是在电子学方面，不论是在远距离通讯方面还是在海底探测方面，法国的科研人员在上世界上都是第一流的。但是，由于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仪器设备日益精良，所以要保持我国科研人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能力就相当困难，而且会越来越困难。因此，我国那么多的专家去国外寻求我国不能提供的仪器设备，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发展武器的角度看，问题也日益严重。原因同样是我国财政能力的限制，它从质和量方面限制了选择的余地。法国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工业力量，我们的出口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力量能跟超级大国的力量相比吗？对比一下是发人深思的：苏联现在六个星期之内生产的坦克，就等于法国军队坦克的总和；苏联的战斗机为法国的二十到三十倍。仅仅举出这两类装备，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最近几年来，用于装备法国军队的武器在数量上一直是很少的，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出口的支持，那么我们的兵工厂早就要关门了。

<sup>①</sup> 1978年6月23日《费加罗报》。

为了说明问题起见，不妨举出下列几种典型的装备的价目：

AMX-30 型坦克：400 万法郎，

SA-330 型直升飞机：750 万法郎，

海市蜃楼 F-1 型战斗机：3,000 万法郎，

“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15 亿法郎，

导弹核潜艇：25 亿法郎，

装备一个装甲师：25 亿法郎。

因此，我国常规力量的虚弱使威慑的可靠性受到了影响。

当然，形势的发展，使反击日益具有分阶段进行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常规力量即是反击的第一阶段。没有常规威慑能力，我们怎么能希望挣脱核僵局呢？没有战区和战术水平的核力量，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的那个中间阶段是什么呢？

今后，在军备竞赛中，中等国家再也无法赶得上大国的竞争能力了，更何况，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不允许它们把国民生产总值 5% 以上的财力用于防务。

## 欧洲和行动战略

那么 法国的前景是什么呢 概括地说 可有四种前景：

——中立主义的独立。但是，法国既不是瑞士那种层峦叠嶂的堡垒，也不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森林密布的庇护所。法国有三千八百公里长的海岸线和一条无法防御的东北部陆地边界，所以易于遭受入侵。1978 年 6 月 11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欧洲的一家新闻俱乐部说：“象法国这样的大国

是不能允许自己保持中立的”。

——世界主义的独立。这曾是法国、英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在扬扬得意的时代所享有的那种独立。很明显，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强国这个概念的标准最终发生了变化，如今，强国应是像大陆一般大的国家，如美国、俄国和中国。法国将永远不能再进入今天或明天的强国之列，英国、西班牙和德国同样是这样。

——依附于他国。如果独立不可能，法国人就只能依附于某一个大国，并从中获得安全。可是，将近半数的法国人拒绝再依附于美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国人拒绝变成苏联的卫星国。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要确保法国人的安全，欧洲联合是唯一理智的、稳妥的和有效的办法。

这是一种理智的办法，因为它涉及到一组具有相同特点的国家：法国的邻居们和它有着共同的愿望，即保卫自由社会和多元化民主，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些国家处在同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威胁之下。二十年以来，欧洲共同体存在着，它在经济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现实性。现在，它可以进入政治和军事联合的阶段。

这是一种稳妥的办法。因为，在当今美国和苏联两家垄断的世界战略赌博中，这种办法能使联合起来的欧洲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第三世界已被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搞得四分五裂，它的前途有赖于出现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象法国这样的中等国家，单靠自身的力量再也不能向非洲或中东供应一切必需的东西，并使其得到发展和保护了。

此外，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由欧洲来统一考虑安全问题，才能改善军备生产的成本与效果之间的比例，才能制造足够的武器来对付战略敌人庞大的装备。为了回答华沙条约国装备的全面标准化，我们实现标准化对提高战斗部队的效率是必不可少的。

1978年6月15日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在国民议会的讲话中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思想：

——民族独立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我国随时准备与盟国，特别是同欧洲盟国的合作；

——我国防务政策的特点是它的延续性。

上述第一点表明，法国的负责官员意识到了现代国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只是想建议更进一步推动这个进程朝欧洲安全一体化发展。在中期之内，欧洲安全一体化将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补充。

上述第二点，即延续性，它证实了核威慑和民族独立是行将结束的这个时期的成果。正是凭借这个成果，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和向下一个阶段过渡。

未来十年即1980年到1990年这个时期的标志是，确立行动战略，以补充威慑战略；用欧洲独立的设想来补充民族独立的概念。

在这个时期，威慑战略的可靠性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依靠的将是一个更有竞争性、更多样化、数量更多的核武库。这个核武库起初是由法国和英国的核力量组成的，然而，由于共同体各国从财政上分担费用，这个核武库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扩大。

尤其重要的是，共同体各国将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的财力纳入共同预算，就能组建一支实施行动战略的必不可少的常规力量。西欧常规力量的倍增将缩小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目前这种不平衡正是战略对手发动战争的真正刺激因素。欧洲联盟将在常规力量内部组建一支强大的干预部队，这是在海空力量支持下推行行动战略所必需的，不过这样的海空力量，目前同样还不具备。

这样，欧洲人就能在整个第三世界，既可以在能源和原料供应国的领土上，又可以在运输这些产品的海上通道上，有效地保护自己的重要利益。

那时候，他们的独立才有保障。这是一种具体的独立，即看得见摸得着的独立。没有这种独立，那么另一种独立，即想象中的独立，就只能是书呆子的幻想。它是一种可怜的、陈旧的、徒有其表的东西。

因此，这是一个正在开始的新阶段。必须有勇气，有想象力。要全面确保法国人的安全，舍此别无他途，除非安于依附于某个超级大国。现在，法国人越来越向往更大的安全。

戴高乐将军在六十年代确立的是核威慑和民族独立的伟大目标。而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即到本世纪末的伟大目标就是：行动战略和欧洲独立。换言之，就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务。

这种顺乎人心的防务是可能的吗？专家们和各国的参谋部清楚地知道，这是可能的。现在，应该由西欧各国政府和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来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了：鼓起勇气和拿出政治意志来。

## 第五章 今日欧洲的防务状况

### 过去的遗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防务并不是欧洲建设中被遗忘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面对着东方的威胁，根据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建立的西欧联盟和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为西欧陆海防务奠定了基础。

然而，不久人们就认为，这些条约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从1951年2月起，关于建立欧洲军的会议即在巴黎召开。1952年5月27日，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等国政府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这样，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成就相比，欧洲的军事建设就显得相当突出，因为在军事方面，有很完整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而在其它方面，当时还只有很有限的煤钢共同体条约。当时，这些古老的欧洲国家似乎能最终捐弃宿怨，朝着欧洲合众国稳步迈进。但这种看法低估了过去的影晌。1954年8月30日，法国议员拒绝批准一项条约<sup>①</sup>，而这项条约，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在作出牺牲后才同意的；同时法国的五个伙伴国对该条约有的已经批准，有的亦即将批准。

走向欧洲联盟的决定性的一步没有迈出去。然而，当时需要把支离破碎的欧洲防务撮合在一起，尽快恢复表面的团

结，以便为德国的重新武装确定一个范围，并建立一个相应的监督机构。因此，1954年10月，人们沿袭布鲁塞尔条约，很快建立了西欧联盟，包括英国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六个国家。这个联盟始终是个空架子，而且可以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它处在一种被人遗忘的地位。从那时以来，没有任何引人注目变化的。

这样，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大进步，但欧洲在防务方面的机构——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显得不足——无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西欧联盟，不仅已经过时，而且还暴露出会给西方防务带来不可弥补的缺陷。

## 北大西洋公约的缺陷

大西洋联盟值得称道之处是想密切欧洲十二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将它们联合在一起，以对付全球的威胁。这的确是对抗华沙条约一体化部队最好的和唯一的办法。如果说，在近三十年中，欧洲终于避免了任何冲突，那么这正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明显的“威慑性”。这是该组织成功的标志。可是，难道不应该把这个威慑力量

这是指“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0年10月24日法国总理普利文在美国的支持下提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1952年5月27日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1954年4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的议会先后通过了该条约。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对264票通过议员奥麦朗将军的建议，拒绝进一步讨论关于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问题。至此“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宣告失败。——译者



归功于美国的核力量吗？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这个防务组织本身就有一些缺陷，使之成了敌方外交—军事行动理想的攻击目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明显的弱点，并不是这个机构本身的毛病造成的。相反，联盟的参谋部和三百个专门委员会集中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军人和文职官员。同样，这些弱点也不能归咎于官僚主义的滋长，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虽然机构繁多，但是相当协调，能够对付单纯的军事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弱点是固有的，甚至从公约文本中就可以看出来。

1949年4月4日签订的这个公约，把过份大的一部分权利划入成员国充分而完整的主权范围之内。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人签订标准条约的最道地的传统而起草的北大西洋公约，概要部分有四页，规定了成员国的权利比义务还要大的“防务合作”。

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在某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受到攻击时，“将单独并协同其他各方立即采取它认为必要的行动予以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以恢复和确保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这里所谓“它认为必要的行动”，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没有约束力的提法！公约的精神及其规定的限制，最终由比利时外交部长汉墨尔先生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在题为《关于联盟未来的任务》的1967年年度报告中说：“作为主权国家，盟国无须使自己的政策服从集体的决定。联盟为交换情况和看法提供了一个讲台和一个有效的中心；这样，每个盟国就可以深入了解其它盟国的问题和目标，并据此制订自己的政策。为此，

重要的是完善和改进在必要时进行坦率协商的做法。”

只要看看联合国这个例子，就可想象得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对各成员国毫无权力可言的情况下，一个讲台的有效性会是什么样子。消除或缓和成员国之间的敌对行为，当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做不到的，因为他的作用仅限于向各方恳求。因此，在仲裁两个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于 1974 年发生的塞浦路斯纠纷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显得束手无策。

至于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应该承认，尽管看来他有某些表面的权力，但他的处境很难说比秘书长要好。

1949 年的这个基本条约，丝毫没有涉及最高统帅及其特权。虽然建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一体化职能机构”，但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十分有限。他只有在“与有关国家当局协商并取得它们的同意”之后，才能确定部队的部署。这类限制性条款在公约中比比皆是。

这样，北大西洋公约法定规章方面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它是一个毫无约束力的公约。这就使得北大西洋公约瘫痪无力面对成员国的退出（甚至还有部分退出）它束手无策。从法国和希腊退出军事一体化机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它也无法确定成员国的共同政策，而这就更为严重了。

此外，公约中还有不少漏洞。这在 1949 年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跨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这就不能容许了。由于这些漏洞，公约在法定规章方面的这些缺陷就更显得严重了。

首先，大西洋联盟只是考虑到北半球这个业已变得狭小的范围。由于组织联盟时设想冲突可能会发生在大西洋周围，即欧洲或北美，所以，它没有把在非洲和中东等地区发生的侵略纳入自己的防务范围之内，然而，对这些地区的侵略直接关系到盟国所需原料的主要来源，正是在这些地区，侵略行为目前正在发展。在可能发生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冲突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种地区性职能就显得不够了。

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谈论北大西洋公约的颇不得体的军事部署。的确，大西洋联盟的防务重点依然是欧美这两个“庇护所”，而现在的冲突却主要发生在其它地区。总而言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缺少一个世界性的防务规模；有了这个规模，北大西洋公约才能在必要时把战斗由东—西轴向转为南—北轴向，从而在各条边界线上抗衡苏联或共产主义敌人。

人们还可以责怪大西洋联盟只是注重军事问题。诚然，条约的第二条就主张成员国之间进行经济合作。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借口经济活动不是自己的职能范围，所以从1957年以来，就只是满足于有一个经济委员会，而其作用又只限于在伙伴国之间交换情报。委员会在这类活动中得到了经济事务领导的支持。这样，联盟就有了一个负责思考问题的机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作出决定颇有启发作用。但是自从1973年底出现原料短缺、供应和储存方面发生的问题以及国际竞争加剧以来，西方肯定需要一个专门机构，能够分析和对付目前的经济战这个潜在而尖锐的危机。因此，把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原封不动地搬到1979年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原因大概是贫富不均，即美国和其它盟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差异，妨碍了联盟的基础。其它盟国懂得，一体化只能有利于强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国家对与其强大的伙伴一起采取经济一体化的行动犹豫不决。而欧洲联盟将来就不会遇到这种不平衡的问题。

至于现代冲突的心理、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北大西洋公约都只字未提。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今天没有能力处理实质性的问题。

可是，即便只就军事方面而言，北大西洋公约也有显而易见的极大缺陷。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在军事方面的规定很明确，而北大西洋公约却与此不同，没有规定军备政策。

无论在军事行动方面还是在军事费用方面，这个缺陷过去和现在都有着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这样，面对装备完全统一的华沙条约组织，西方联盟只拥有各种各样牌号的军事装备，质量虽好但并不能补偿武器没有标准化和不能互相配合使用这方面的缺陷<sup>①</sup>。

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的这种不统一和不协调造成的不堪忍受的种种弊端，人们认识得更清楚了。现在只举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上述情况使北大西洋公约的效率每年通常要降低 30%；预算每年浪费大约一百亿美元。<sup>②</sup>

标准化是指生产相同规格的装备供应给各个成员国。互相配合是指尽一切努力使原来设计不同的各种武器能在战场上互相配合作战。

<sup>②</sup> 为了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些概念，我们举法国的例子：1977 年法国的防务预算竟相对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

总之，人们不难想象，一项有着这么多漏洞和缺陷的公约是难以执行的，而且往往也是令人失望的。

不过，如果要替北大西洋公约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们辩白几句的话，那么应该承认，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最好地利用这个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公约。然而，他们毕竟未能创造奇迹……

## 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的缺陷

一旦遭到侵略，成员国可根据公约第五条规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行动。鉴于这些行动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的问题是如何把尽可能多的成员国的军队投入初期的战斗中去。为此，北大西洋公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选择了一种称作“夹心蛋糕”的部署，即用组织盟国军团交替驻防的方式，这样，可使好几个成员国能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就投入战斗。

如果说这个方针符合政治上的需要，即团结需要的话，那么可惜它不符合战术的需要。事实上，大西洋联盟目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部署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在军事部署地区，甚至连驻防的地段都互相重叠交叉。在有的地方，和平时期的驻防地区距离战争时期的阵地很远，50%以上的中欧地面部队得奔走一百多公里才能抵达战斗阵地。

这样，战争一开始，敌人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力量投入它认为是敌方的最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投入敌方甚至来不及还手就会被置于困境的地区。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还有一些人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使得它在组织方面的瘫痪无力更为严重了。例如，有些人声称要用大部队来确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防务，可是，这些大部队并不驻扎在那里！荷兰第一军团就属于这样的大部队，可是它几乎全部驻扎在本国领土上。美国的部队更是这样，他们的装备，封存在莱茵河西岸，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则是在一旦得到警报的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大规模空运到现场。

克洛兹将军和斯顿霍夫将军在《欧洲有没有防务？》和《不知所措的北大西洋公约向何处去？》这两部著作中，指出了在闪电战时代如此用兵的全部危险。在美国看来，大规模空运非常合算，因为这样它就不必在德国维持额外的部队，所以它是不大可能放弃这种做法的。

万一发生危机，事先也会获得情报。过分相信情报，也应当算作是一种幻想。因为，一方面，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情报，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苏联部队的调动被发现了吗？几个小时之前发现的？另一方面，即使取得了情报，可靠性又怎样呢？赎罪日战争时以色列的教训使人对此大可怀疑。

总之，许多战略家对常规战争的关注，远不如他们对构成西方威慑力量的另外两个因素，即战术核力量和战略核力量的关心。但他们大错特错了：狭小的欧洲战场正好有利于打常规战争。

由于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一些特殊问题，所以美国人显然不会把几乎完全由他们垄断的核武器交给盟国任意支配。过

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不过，为了照顾这些盟国的敏感，美国还是规定了一个参与的范围，把部分发射装置交给它的盟国，但是核弹头仍由美国控制，使用核弹头依然必须取得美国总统的许可。

在这种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够做的，只是研究如何在欧洲打一场美国的核战争，并且确定具体的方针和实施办法。核防御事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能做的，只是如此而已。不过，还算不错，在这两个机构内，当涉及到可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使用核武器问题时，欧洲盟国还能说上几句话。

美国要控制一切核冲突，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即如何使一支真正独立的核力量——法国的核力量——和超级大国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并存下去。

同样，由于美国在联盟内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位置总由一位美国将军占据着。

由于欧洲人在军事上的虚弱，美国就在联盟的指挥权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但不管这是多么有道理，难道就不能通过把欧洲国家团结在一个有利于改革已经过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的组织里来改变上述情况吗？

那么，欧洲人在防务方面的唯一组织西欧联盟，在这方面能不能有点用处呢？

拿骚协定为英国规定了一个例外：“当女王陛下政府认定国家最高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自行使用北极星导弹。但是，英国的四艘核潜艇却编入了北大西洋公约。

## 西欧联盟的缺陷

安东尼·艾登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创建的西欧联盟自从 1954 年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及集体防御条约”使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三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情况将一直继续到 1998 年<sup>①</sup>。为加强这种关系，它设立了一个外交部长级的理事会、一个设在伦敦的常设理事会、一个特别议会（八十一名议员）以及下述各附属机构：总秘书处；军备管理处；常设军备委员会。

但是，不要对这套徒有其表的组织机构产生什么幻想，因为西欧联盟只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还不足两百名。在其存在的二十五年当中，它一直处在毫无生气的状态中。

西欧联盟之所以会这样，是由该条约形形色色的条款造成的。这些条款规定，不论从军事观点还是从经济观点看，它都不应当起和其它组织相重迭的作用。

这个西欧联盟是否能够成为欧洲防务复兴的工具，比方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支柱呢？

遗憾的是，必须承认，照西欧联盟今天这个样子，它只能适应人们在 1954 年的要求。

首先，西欧联盟是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之后，为了给重

该条约是 1948 年 3 月在布鲁塞尔签订的，有效期为五十年。——译者



新武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规定一个范围而特意建立的。为此，在有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的议定书中，规定了如下措施：

—— 联邦德国保证“不在其国土上制造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不制造远程导弹、超过一定吨位的军舰和战略轰炸机；

—— 波恩政府同意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有关机构对之进行监督，以确保其遵守义务。

今天，是西欧联盟的军备管理处负责监督德国的军队和工业。

一个对联邦德国如此不放心、限制得这般死的条约在莱茵河彼岸不会获得什么好名声，这是不难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伙伴对西欧联盟就采取极大的保留态度。仅凭这个事实，就难以指望这个组织来重振欧洲的防务。不管怎么说，怎么能把共同主权建立在猜疑和监督的基础上呢？

人们对西欧联盟提出的第二个批评是，在这个一般的合作机构内部作出决定相当困难。的确，条约规定，外交部长一级的理事会的所有重要决定都得一致通过。只有那些明确规定的次要决定才能以三分之二多数或简单多数通过。

一切必须由表决者一致通过的组织，其软弱无力是人所共知的。此外，即使西欧联盟条约包含某些令人感兴趣的保证，特别是关于一旦发生侵略即自动进行协助的条款，但它仍然使这个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有着根本的弊病。西欧联盟理事会几乎从来不开会，这也许不是偶然的。

由于西欧联盟不包括欧洲共同体的全部国家，而且还在

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带来了一种歧视性因素，所以西欧联盟不能构成建立欧洲安全机构的基础。

## 当前的弱点

好象是为了证明欧洲存在极大的一致性似的，西欧各国军队的现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事实。

防务预算的增加不能适应人员费用，特别是装备费用的增加。结果，就得努力重建预算平衡，一方面需要减少兵力，另一方面必须压缩装备。由于已不能单靠本国力量制造一应俱全的军事装备，所以，这些国家就偏废防务的某些方面，而注重其它方面。在英国，军队人数缩减，军饷维持在一个极低水平上，为的是用昂贵的本国军火重新装备军队和……为在北爱尔兰维持秩序提供经费。

第二个事实是由于不适应上述形势造成的。如果在欧洲和大西洋范围内加强合作，推动进一步的一体化，那么就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实行专业化，从而更好地使用不敷应用的防务预算。可是，现在各国依然在自己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这种情况，甚至有所发展。欧洲军火工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内部市场的竞争，使它们脱离了实际：它们的投资额充其量超不过美国的一半，它们有什么生存的希望呢？这些工业已经不得不依靠程度不同的变相的国家补贴大力资助，才能在武器生产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就连可望成功的工业部门，也注定只有中期的前景。达

索·布雷盖财团的军事工业部门正在衰退。它在1976年那桩“百年不遇的买卖”<sup>①</sup>上的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它那种植号的飞机没有竞争能力，成本高，性能差；但另一方面是法国的可信性不高：既然法国不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提供它们能从美国获得的那种核保证，它们为什么要在政治上选择法国呢？

在任何领域内，依然还是那条规律：各行其是，各谋其利。某些国家的军队是职业兵，另一些国家的军队是义务兵。一些国家甘愿把服役期延长，另一些国家则尽量将其缩短。一些国家重视陆军，另一些国家强调海军，还有一些国家则注重核力量。他们事先不协商就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从来也没有有计划地相互取长补短。

然而，要弥补国家预算的不足，办法还是有的，这就是分担任务、共同制造和调整做法；可是，在这方面什么都没有做或者说几乎毫无所为。

第三个事实是前两个事实的必然结果。由于这些军事负责人能支配的财力物力严重不足，但同时又不得不装点门面（哪怕仅仅是为了表现出依然具有威慑性），所以只能在国家对他们的财政拨款范围内凑合着办点事。

遗憾得很，他们要在对上级的汇报、指挥上的不同意见、对士气和实战能力的估量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妥协。然而，最严重的妥协还是反映在军队本身的结构方面，因为虽说师

<sup>①</sup> 1975年初，西方国家打算为自己的空军更新装备。参与这次更新装备而进行竞争的飞机有：美国的F-16法国的“幻影”式F-1和瑞典的“雷”式战斗机。由于成交额巨大，所以被称作“百年不遇的买卖”。——译者

的数目维持住了，但这些师的编制和装备却缺额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sup>①</sup>。

第四个事实同样与防御的动机有关。

某些人——这种人现在只有在少数地方才能遇到——认为，民族爱国主义依然足以确保防御的持久性。而在那些了解我们这个开放性社会的人看来，与封闭社会相联系的民族观念正在衰亡，它再也不能激励人们去抵御外侮了。

欧洲这个观念能否提供一个新的推动力，激发一种防御精神呢？为此，欧洲人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地意识到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总之，欧洲防务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它虚弱不堪，困难成堆，可是潜力很大。

在华沙条约内部，情况正好相反：师的数目没有变，但编制和装备却平均增加了三分之一。

## 第六章 处在一体化边缘的欧洲

### 复兴政治

欧洲建设事业虽然还不到三十年，但它的历史似乎已相当古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奠基之父”们就为和平和现代化的欧洲打下了基础。他们当时要法国人和德国人取得和解，想把欧洲国家从1929年危机时陷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生产上的马尔萨斯主义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些共同的机构，战胜者和战败者平等相处，一起讨论它们之间的问题，并寻找共同的答案。这样，首先在1951年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接着，于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相继诞生了。

### 继承者的失职

六十年代末期，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了，他们是技术管理专家，他们对于战争的记忆已经很淡薄了。特别是因为共同体的发展使欧洲人所考虑的只是未来的前途，而不再去想什么复仇的事情，所以，过去的战争就更显得是遥远的往事了。但是，技术管理者缺乏政治想象力。西欧国家的官僚机构曾一度被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们大胆地冲破了，可是现在又在技

术专家们的放任下故态复萌，重新建立起来。官僚主义是局与局、部与部之间相互对立的根子。各国之间互不信任，其根源存在于各民族的传统意识中。领导者们犯的错误的在于，他们只关心这些机构完成公务如何，而没有赋予它们对欧洲事业的热情。欧洲事业的前景是建设“新疆界”以便使这个小小的欧亚大陆之角扮演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角色。

十多年来，欧洲联合的理想一直苦于没有合法地位。理想破灭的时期大概开始于 1963 年。这一年，戴高乐将军终止了他本人发起的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辩论；他把个人专断的外交运用到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上来，断然拒绝英国加入共同体。失望带来猜疑，德国变成了一个深感幻灭的伙伴。它处处讨价还价，说什么各国间的接近要礼尚往来，鼓吹一种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英国加入了一个非政治化的共同体，并且竭力破坏共同体现有成果的基础。工党政府 1975 年上台后，立即要求进行重新谈判，其目的主要是想修改共同章程，使之适合于英国的利益。

共同体的部长级会议，不论是讨论农业问题、货币问题还是工业问题，都逐渐变成各国利益相互冲突的场合。由于共同体的作用缩小到了经济方面，所以在某些人看来，它很象一个主要关心买卖成交的共同超级市场。

部长们养成了商人们的一套作风，颇善于为眼前的利益而顽强地讨价还价，以便捞取任何微小的利润，去满足本国不同实力集团的欲望。为确定享受市场组织补贴的主要农产品的共同价格，一年一度的部长会议都开成了马拉松会议，成为各国代表之间的实力较量。消费国希望提价要有节制，而生产

国则只关心提高本国的生活水平，结果双方的要求背道而驰。自七十年代初期以来，各国货币间的差价随着国际投机活动的消长而不断变化，这更使得部长们的讨论趋于复杂化，而负责确定共同利益的机构——委员会，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 欧洲的联合势在必行

罗列一下共同体面临的种种困难，当然是高雅的。在各国行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当谈及欧洲问题时，占上风的是失败主义和怀疑主义。但是，这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先驱者们开创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这些无能的后辈们只晓得墨守成规，把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古老、最因循守旧的东西视为珍宝。一度被忘怀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如今又复活了，并象过去一样值得夸耀。然而，事实是无情的，那些不懂得联合起来的国家，在新的世界环境下，正在走向相对的衰落。尽管传统主义的观念形态仍然可以把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唯一合法的化身，但是它并不符合当代世界的要求。

因此，从这个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用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理解基础上的价值观取代过时的价值观，则是青年一代的责任。宣扬什么主权神圣的法国或英国以自己的文化和威力而普照天下的形象，只能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任何人都无权

委员会是指欧洲共同体的常设机构。它由十三名委员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五人。总部在布鲁塞尔。——译者

拒绝承认，国际环境条件的变化要求昔日居支配地位的强国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适应这一切。

将来，人口爆炸性增长，原料和能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毁灭手段的扩散所造成的问题，都要求找到世界规模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没有美苏勾结就会建立起这样一个世界组织，那是空想。二等国家将只能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忍受强权政治之苦，要么接受一场自杀性的武装冲突。

从中期看，区域性联合是唯一符合形势要求的组织形式。因此，欧洲的统一象是一种具有典范作用的试验。当然，它的困难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自 1950 年以来，欧洲统一的进程是建立在各个独立国家自愿承担义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个主宰大国企图实现对它自己有利的欧洲联合，而西欧又不甘忍受这种联邦式的枷锁，人们应该对此感到懊恼吗？欧洲人长期生活在安全和繁荣的幻觉之中，而这种安全和繁荣只能靠自己的出色工作才能得到。他们并没有完全懂得，客观形势要求他们把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

## 政治联合和防务：同样令人忧虑

因此，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即通过支持共同体建立的经济机构，并赋予经济机构所缺少的前进动力。把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截然分开的作法是不符合对具体形势的分析。要建立旨在统筹外汇储备和规定预算方向的货币联盟，离不开政治上的仲裁。同样，关于政治一体化的任何设想也必须通



盘考虑战略和军事方面的现有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决定着正在塑造中的统一欧洲的安全。

应当揭露这样一种欺人之谈，认为要讨论欧洲的防务问题，必须首先实际建立起某种政治权力机构。众所周知，这种权力机构如果不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在安全方面行使国家政权的传统特权，它就不会有任何可信性。所以，只要人们拒不赋予政治联合以起码的内容，那么，通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就是阻塞的；当全世界都知道欧洲共同体不拥有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时，那么，在共同体寻求发言权的各种国际性的会议上，它的共同立场又有多大份量呢？

欧洲防务体系既是政治联合体的自然属性和外在表现，也可以成为它的原动力。各国领导人和公众舆论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安全问题的全部要求，那么就会为实现政治联合创造方便条件，加速进程。迄今为止，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之所以迟迟不能纳入欧洲联合的总体计划之中，原因就在于各国领导人把防务当成了自己的禁裔。对法国来说，民族独立的神话使得任何可能和外国伙伴分享其防务手段的集体行动，都成了亵渎神明的行为；而对这些外国伙伴来说，摈弃北大西洋公约的保护而又没有其它替代办法提供同等的保护，也是不堪设想的。自从 1954 年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以来，尽管欧洲九国装模作样地表示完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其实是生活在被奉若神明的美国保护的树荫之下。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共同体，发挥与自己的经济和贸易实力相称的世界性作用，这种正当合理的抱负使得它们拒绝建立政治和军事联盟的态度极不协调，而政治和军事联盟的实现将是欧洲共同体最为壮观的

篇章。

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想使这一辈人放弃行动。在欧洲建设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民族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是多么起劲地否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可是他们却拿这项事业的艰难性作挡箭牌而拒绝参加进来。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障碍一旦被克服，就会变成继续前进的立足点。

通过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把同意将其防务手段联合起来的国家组织成欧洲联盟，这种前景在今天看来不管显得多么遥远，但绝不是没有必要的。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发展中的联合体，各个成员国之间正在建立起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客观上的利害一致是存在的。可是，各国政府缺乏远见卓识，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能下定决心，立即得出政治方面和组织机构方面的结论。

1974年12月，欧洲共同体九国政府首脑阐明的目标是，在欧洲联盟内部发展和合并现有的一体化机构。一切决心献身于这一创造性事业的人们，都应竭尽全力，从各个方面去塑造欧洲联盟。

## 政治欧洲：一个久经磨难的课题

今天存在一个政治欧洲吗？如果认为在欧洲条约范围内，有关负责人行使经济职权时需要担负政治责任，比如，共同体每年确定某些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水平，这种安排就有着突出的政治意义，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对上面的问题就会给予肯定的回答。然而，欧洲政治联盟的

拥护者和反对者所坚持的传统解释依据的是两种标准。第一种标准是组织方面的。所谓政治欧洲应该具有一个享有主权的机构。这个机构犹如民族国家那样，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第二种标准关系到这些机构的职权范围。这个职权范围除包括经济事务外，还应包括外交和防务。

自从欧洲重建以来，关于政治联合的辩论正是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标准出发而激烈地进行着。当法国于 1950 年提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方案时，辩论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确实，旨在实现人力和物力等军事手段一体化的专门机构——欧洲防务共同体，它已具有组成一个真正联邦式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萌芽。1954 年 8 月 30 日，法国国民议会拒绝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从而结束了这种试图一举超越六国国家主权的尝试，这六国当中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的会同意剥夺其主权的。

这次失败严重挫伤了欧洲人的雄心壮志，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分部门实现一体化的道路。1958 年，他们满足于实施各项罗马条约，其中的一个条约是关于原子能方面的，另一个是关于组织一个总的共同市场。

把“政治联合”这一概念重新纳入欧洲建设的语汇之中的是戴高乐将军。然而，人们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之间国家关系的构想。富歇计划延续了不到两年，但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它一直影响着欧洲政治建设的整个进

为执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第三十八条，P·H·斯巴克主持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会议（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议会）于 1953 年向各国政府的代表们正式提交了一个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公约草案。

程。

在法国倡议下，1961年2月11日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研究委员会，负责“为欧洲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各项条约中既已寓有的政治联合愿望确立组织形式”。在有关这种政治联合的规模和含义方面，引起了其它国家的误解。但是，当法国代表向其伙伴国提出与它们自己的愿望相违背的建议时，误解迅速消除了。法国主张按政府间合作的传统模式建立一种“国家联盟”，设立一个政治秘书处和总理或外交部长的定期会议，以致力于协调对外政策。这种联合的使命不过是把业已存在的各个共同体囊括在一起，这意味着把这些共同体根据条约而具有的那一点微小的超国家内容抽掉。法国的伙伴们深感巴黎的倡议对欧洲事业是弊大于利，而且，对倡议没有提及他们倚重的大西洋联盟感到不安，所以以后便中断了商谈。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虽然激起了戴高乐将军对共同体机构的更大反感，但大概仍不失为远见之虑。当时，法国所关心的，主要是要利用欧洲来支持它自己的世界政策，而不是为欧洲建设效劳，赋予它以独立的共同机构。

我国的伙伴们并不打算甘当步兵这种配角，使自己的唯一抱负缩小为支持法国的外交。法国认为，自己是欧洲六国中唯一拥有一项正当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国家，而邻国的外交，按规定只是依附于美国的立场，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外交可

欧洲共同体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也称煤钢联营）和原子能共同体（也称原子能联营），其中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最重要，所以通常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叫做欧洲共同体。——译者

言。这种看法难道是善意的吗？这一事件由法国 1966 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而变得更加严重。从那时起到 1969 年戴高乐将军去职，欧洲政治联合的前景再也没有正式商谈过。

1969 年 12 月的海牙首脑会议<sup>①</sup>开辟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标志是，务实派接过了先驱者一代的旗帜。蓬皮杜总统搬掉了他的前任对英国加入共同体设置的原则障碍，条件是共同体必须同时走上“完善”和“深化”的道路。这种双重要求，首先为解决共同的农业政策的费用由集体负担的问题，为重新研究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但是，根据海牙首脑会议的精神，也建立了“政治合作”的制度。时至今日，各成员国依然坚持着这种合作制度。

## “政治合作”的宏图及其局限性

请局外人千万不要上当：外交界或欧洲消息灵通人士的圈子里所指的那种“政治合作”只有微不足道的实际内容，它还仅仅是一般传统的政府间磋商所达成的结果。政治合作的方法和实施范围是在两个文件中确定的，即一个是卢森堡会议报告，一个是哥本哈根会议报告。这两个报告分别于 1970 年 10 月 27 日和 1973 年 7 月 23 日由外交部长理事会通过。第

<sup>①</sup> 1969 年 12 月 1—2 日，共同体六国首脑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主要讨论共同体的发展和扩大问题，决定加速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表示要“为一个统一的欧洲铺平道路”，并决定同英国等国家就申请加入共同体问题重新谈判。——译者

一个报告是受海牙首脑会议的委托、在比利时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达维尼翁子爵主持下起草的。第二个报告是根据参加1972年10月22日巴黎最高级会议的首脑们的决定起草的，其目的是把伙伴国在会议过程中刚刚实行的那些做法加以发展并且予以制度化。

虽然部长们受权就对外政策进行磋商，但目标是有限的：“通过互通情报和定期协商，确保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深入了解。协调彼此的观点和态度，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采取共同行动，以加强上述有关国家的团结。”但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外交部长们每年聚会四次，由各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组成一个政治委员会，必要时即举行会议，负责为外长会议进行准备。外长们讨论后而产生的技术方面的问题，由各国政府建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

这种体系象是富歇计划中所提建议的翻版；但它具有毫不触犯条约规定的优点。参加政治合作会议的部长们甚至还小心翼翼地想摆脱共同体机构的羁绊。政治委员会无权参与政治合作会议的讨论，只能对某些可能会影响共同体活动的问题提出简单的看法。部长会议没有规定任何表决程序，这恰恰反映出政府间合作的实质，这种合作的目标不是为九国政府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而只是把各国的不同观点揉合在一起。外交方面的共同立场只有在九国找到最小的公分母时才能形成。

在制定欧洲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强制性规定，这意味着各成员国仍然把外交视为禁脔之地。但是，客观需要却越来越经常地强迫它们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以便更有效

地适应这几年来出现的许多问题世界化的形势。

## 共同的外交政策是否已初露端倪？

在戴高乐时期，法国与其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伙伴们对立了十年。这种欧洲内部的不和，使观察家们对欧洲联合的前途产生了严重的疑虑。所以，他们对于自 1973 年以来九国共同体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的共同立场的意义，正在进行反复的估量，这包括：关于近东问题的声明；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欧洲—阿拉伯对话；对于南欧形势，特别是葡萄牙局势演变表示的一贯关注；九国在联合国内协调立场；1975 年在塞浦路斯事件中九国不断协商并共同进行斡旋活动；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时提出共同的文件；在南北对话中，不论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还是在巴黎会议（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等等。

通过这一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共同体国家的外交人士们已经形成了共同磋商的习惯，并且开始寻求共同语言。这种“欧洲外交场所”的形成，应当有助于削弱各国代表追求本国私利的倾向。看来，对国家的忠诚可能会逐步过渡到对整个欧洲的忠诚，这将使每一个负责制订政治合作计划的官员认识到，共同体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

这样一种过渡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对制定共同外交政策最迟疑不决的那些国家还在强调说，硬要一个欧洲国家走上不适合自己的外交道路，那只能是人为的，是不正常的。这类困难主要倒不是由于国家官僚主义传统的严重影响造成的，

而是由于各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差异造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证明，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有其自身的利益。然而，对于这一点，它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

## 欧洲人的共同价值观：自由和自由民主的体制

西欧是一个客观上利害一致的国家集团。这些国家都具有基于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犹太—基督教教义的文明。这种文明推崇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个人应当拥有维护人身安全和精神自由的基本权利。自由民主制度的法律，保障每个公民享有一切“形式上的”自由：包括迁徙、信仰和言论自由，公民受法律保护，结社权，选举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闻权，等等。最近，自由民主社会又承认了每个公民的“实际上的”自由权，使公民拥有正常生活和请求集体帮助的物质手段，包括新闻权、医疗权、退休权、最低收入权、免遭失业权、咨询和参与权、承包自由，等等。这些规定保障个人不受政府的专断侵犯。

可能，欧洲民主国家目前实行的这一整套自由权还是不充分的，一方面，人们必须服从维护公共秩序、保证社会安宁和讲求经济效率的需要；另一方面，每个人又有自由生活的权利。在这两者之间，平衡是脆弱的，这种平衡只能建立在一种靠默契而维持的社会契约上。国内恐怖主义和镇压之间相互促发的情况已经损害了这种契约，不过它还不为人们所注意。我们民主制度的精神，即在于追求达到自由理想的意志。所谓自由，就是一种有益的目的，一种属于人的理性，它既不是



一件奢侈品，也不是一块租借地。

今天，关心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受威胁的孤岛：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得一个官僚军事集团掌握了政权。这个集团认为，自己是决定一种专制的集体主义制度的模式和延续时间长短的唯一合法裁判人。

——在右派专制国家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上层军人集团或政治寡头们依靠僵化的机构和暴力来维持他们的特权。这些政权缺乏对人的信赖，而以各种限制束缚他，声称这样做为的是保护个人不被自由意志引入迷途。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迅速发展，又要防止种族、宗教和语言方面的离心倾向以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时掌权的上层人物又不成熟，这一切是产生专制政权，并且常常是独裁政权的根源。那些享有特殊威信的领导即独立英雄和象征人物滥用个人权力严禁一切反对力量。他们常常在宫廷革命中被军人搞掉，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人民没有任何基本自由，暴力成了政府使用的常见手段。

总之，在全世界四十亿人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享受不到自由。因此，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欧洲人处于享有人道主义的最后幸存者之列。除欧洲人之外，只有北美人和少数几个分散在世界上的民族逃脱了暴力对人权的统治。

1950年10月4日 欧洲委员会<sup>①</sup>成员国通过的欧洲保卫

欧洲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5月5日，最初由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和爱尔兰等国组成，总部设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译者

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就是以法律形式体现了维护某些共同价值观的意志。但是，由于缺乏能实行制裁的真正司法机构，所以这些条文只具有微不足道的实用性。公约的价值仅仅在于表明，它希望成为一个经济利益一致的集团的政治之花和道德支柱，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设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个软弱的组织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欧洲共同体则重视制定保护欧洲公民的一整套准则，这有助于赋予它目前所缺乏的道德基础。当着广大群众经过引导，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对于欧洲式价值观的热爱时，一个不可抗拒的拥护建立共同防务的运动就应运而生了。当着欧洲统一的支持者们要使他们的同胞认识到，欧洲统一过程与捍卫多元化民主的斗争是同一回事时，他们的抱负就接近要实现了。

## 地中海的贡献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兆：欧洲共同体正在扩大到南欧三国。1974年7月，希腊军人政权垮台，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组成政府。葡萄牙成功地抵御住了无政府状态和军国主义的诱惑。1975年11月佛朗哥死后，国王朱安·卡洛斯对西班牙的治理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进展。这三个国家的内部演变说明，各国都有一批在政治上清醒的、负责的出类拔萃人物，他们选择了欧洲。但是，雅典、里斯本和马德里先后于1975年6月、1977年5月和7月申请加入共同体的意义并未被共同体成员国充分认识到。

诚然，这三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加入已经广泛受到经济危

机威胁的共同体，会带来许多困难。共同体成员国指出这方面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共同体扩大之后，共同体内部最贫困地区和最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进一步加大；成员国在决定将其经济联系在一起时承担的互助义务，将变得更加沉重和代价更为高昂。在农业和社会事业方面，在某些工业部门，这三个候补成员国的产品具有竞争力，这对法国和意大利某些业已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构成直接的威胁。

只有当共同体囿于一种停滞不前的和单纯经济的发展观点时，上面的消极看法才能站得住脚。这种消极的看法之所以是停滞不前的，是因为共同体成员国如果采取发展某些共同的农业政策、地区政策、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的话，它们将拥有更为机动、更为宽裕的财政手段，从而使三国参加共同体带来的挑战得到克服。

希腊、葡萄牙两国与共同体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通过两国政府在共同体官方和私人资金的支持下，执行内部调整计划和扩大投资，是可以逐步缩小的。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仅等于共同体的 2% 这表明 共同体无须作出过大的财政牺牲，就能给予里斯本和雅典具有决定意义的支持。西班牙是世界上第十个工业强国，尽管暂时还有严重困难，但发展潜力很大，几年之后，将会在共同体中名列前茅。

单纯的经济观点，蒙住了成员国中某些人的眼睛，他们把共同体的事业仅仅看成一个商业性的联合会，其信条是单纯为本国利益谋取最大好处。而三个地中海国家采取的这一步骤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质。它们想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把尊重

民主准则视为加入条件的集体牢牢联系在一起。它们深知，经济上相互依赖，定期参加共同体机构的会议，各国领导集团会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从而使民主的抉择最终变得不可逆转。

维护西欧安全的重要条件，在于欧洲南翼国家现行政权保持稳定。地中海是所有欧洲国家获得能源和原料供应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战略地区。欧洲国家只能对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三国的内部变化感到庆幸，因为这三国长期处于右派独裁统治之下，现在居然成功地打破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因为按照这种规律，它们本来可能会堕入左派独裁统治之下的。

此外，三国的加入将使共同体对地中海的控制范围扩大一倍。扩大后的共同体将能控制欧洲大陆海上供应线的三个咽喉要道之一的直布罗陀海峡，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另外两个咽喉要道附近：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共同体的领海和领空范围将增加近三分之一。最后，亚速尔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上的基地将成为未来欧洲防务体系的战略据点。

如果欧洲共同体在扩大的同时，不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共同的手段和决策机构，那么从九国过渡到十二国就会削弱经济上的协调一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迄今一直以欧洲大陆的西北部为中心的共同体，通过向南方发展而建立起新的平衡，将会使共同体在实现政治联合和共同防务的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从而提高统一程度，增加安全因素。

## 第七章 建设欧洲防务：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因素

### 经济危机和防御手段

迅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西方自由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普遍利用廉价原料和能源的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贸易的自由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加强，每个欧洲国家的经济都极易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1973—1974年发生的以原料、特别是石油大幅度涨价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危机，暴露出工业国家繁荣的脆弱性。

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逆差构成了恶性三角形的顶点，使各国政府处于困难境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社会财富进行较为公平的再分配是容易的，但在经济停滞时期，前景就很渺茫了。正因为如此，经济结构的缺陷，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差别，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就变得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了。由此产生的失望情绪，深深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购买力的不断增长上。三十年当中，所有欧洲人一心追求的就是扩大自己的消费，因此，他们就很难接受对于自己的“致富权”的侵犯和损害。

由于物质基础发生了动摇，而且精神领域的观念形态又不适应以“电子工艺”为特征的新文化，所以资本主义自由民

主体制面临失去和谐一致的危险，从而暴露出掩盖着的弱点。渴望社会正义，本来是欧洲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但它也有被只想“保持既得权利”的情绪默默取代的危险。而这种情绪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僵化，直至爆发世界性危机。工联主义的主要倾向是行帮思想，而不是关心变革。所以，如果工联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就会促使居民中不同年龄等级的人们的反抗提前爆发，因为他们感到，在这个走投无路的社会里，自己被抛弃了。

经济危机对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已经无须加以论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一直生活在目前这个联盟制度下。在这些西欧国家里，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兴起，可能有一天会危及到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隶属于联盟的地位。如果欧洲爆发一场危机，就不能排除共产主义势力或者反动势力乘机发展壮大并进而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那时，欧洲就会分崩离析。

现在，欧洲国家的防务能力已经受到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国家的国民生产相对下降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在选举时赢得各个社会一职业阶层的宝贵支持，不得不照顾它们那些小团体利益的要求，这样，政府就很难维持防务部门确定的预算目标了。

在民主政权下，几乎不可能执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因此，对每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恢复国内经济的重大平衡，是增强其外部安全的条件之一。1979年3月，在欧洲理事会倡议下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经济一货币联盟的其它步骤，都有助于加强（虽然是间接的）欧洲防务体系的基础。

## 分散造成的浪费

过去，欧洲国家甚至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形势下，也只是把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用于防务开支。今天就更不待说了！欧洲各国防务的各自为政造成财政方面的重复开支，这种现象进一步限制了军备努力的成效。许多欧洲国家不得不分别承担后勤工作、通讯联络、武器的设计和制造等方面的费用。当着一个国家的军队不参加国际合作时，这一切开支都会压在自己头上。

西欧的防务能力和苏联的差距在常规军队方面是很明显的，在核力量方面更是如此。倘若没有美国驻在欧洲战区的军事力量，这种差距将是致命的。若把共同体九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和（1977年为15,740亿美元）与苏联国内生产总值（9,000亿美元）<sup>①</sup>作一比较，这种不平衡就令人吃惊了。欧洲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美国（18,900亿美元）几乎是苏联的两倍。共同体九国虚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它只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少一部分（1978年是600亿美元，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用于防务开支，而苏联人以紧缩生活消费为代价，竟能拿出近1,300亿美元用作军费开支。

大西洋联盟各国1978年为安全花费了大约1,800亿美元，那么为什么它们还口口声声说安全没有保障呢？因为，西方并没有把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财政优势转化为军事投资，从

本段提供的数字均系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1978—1979年度军事力量对比》中的估计数字。

而使自己获得与苏联相比拟的军事进展，反而由于各国防务计划自成一体以及各国力量的分散，结果这种财政优势被糟蹋掉了。

美国一位名叫托马斯·A·卡拉汉的大学教授在1975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试图从财政费用和实际效果的对比这个角度总结大西洋联盟建立二十五年来情况。他首先指出，联盟的主要国家将50%以上的防务预算用于人员开支，而人员开支在苏联的防务预算中只占30%；德国和美国的装备投资费用<sup>①</sup>只占防务总支出的29%而苏联则高达50%。欧洲常规装备的生产，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广阔市场，所以无法降低成本，这样，由于重复生产而带来的浪费，估计为生产费用的25%。在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方面，美国每年花费五十亿美元，欧洲花费二十六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浪费掉了，因为大多数研制和发展项目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

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对于欧洲大陆的整体防务是有害的，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在行动能力方面也是这样。联盟内部十二个国家的军队使用着十三种型号的近战武器、六种型号的短程导弹、七种型号的中程导弹和五种型号的远程导弹<sup>②</sup>。卡拉汉报告的总的估计是，由于各国发展防务的努力不统一，大西洋联盟每年造成的浪费，在研制和发展方面为二十

防务开支中的装备投资费用包括军事建设、购买武器、研究和发展武器装备的费用。——译者

<sup>②</sup> 1978年3月，美国军备控制总署提交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北大西洋联盟成员国共有二十三种不同型号的战斗机，备件和弹药不能互换，他们使用的三十毫米口径的大炮有四十种不同型号。



六亿美元，在生产方面为三十亿美元，在后勤支援方面为五十六亿美元。

## 防务合作势在必行

如果欧洲在武器生产方面进行合作，那么好处是很多的。从工业生产角度看，合作的好处是，能用同样多的研制和发展费用可以搞更多的项目。失败的风险由大家承担，先进的工艺共同分享。从军事方面看，市场超越国家范围已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先进武器系统的生产成本已高得骇人听闻，生产这些武器对于一个中等国家来说，在财力上是无法承担的。法国逐渐实行一种向国外尤其是向第三世界出售军火的政策，想借以摆脱这种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这样，它就能扩大同类产品的生产 降低成本 并能赚取外汇。

这样做在政治方面并非没有危险，因为这会导致把军事技术转让给那些无论在保持联盟关系还是在选择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大可靠的国家。同时，还得考虑购买国在武器设计和使用方面的特殊需要，这些需要可能跟法国军队的需要大相径庭。

如果不承认欧洲国家在合作方面进行过有时是卓有成效的尝试，那是不公正的。例如，欧洲集团的成员国 1975 年 11 月主动建立了一个包括法国在内的新组织：欧洲独立计划

欧洲集团是指除法国、爱尔兰和葡萄牙以外的大西洋联盟欧洲成员国。它成立于 1968 年 11 月，目的是要增加欧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备制造中的份额。

小组。这个小组的目的是在武器采购方面进行合作，并确定一种共同的立场，作为同美国讨论防务装备问题时的基础。三个专家委员会分别负责研究制定装备计划，研究在特定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在武器的制造、出口、技术转让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各成员国军事装备局局长经常举行会议，交流看法和经验。

法国参加这些工作，对欧洲军备合作的前途是一个积极的征兆，意味着巴黎在不重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机构的条件下，愿意和其欧洲伙伴推行共同的计划。

另外，法国早就参加了不损害其利益的双边或多边计划。它和英国一道研制成功的“美洲豹式”飞机是一种战术、教练两用飞机，机体由英国飞机制造公司和法国达索·布雷盖公司共同制造，发动机由英国罗斯·罗伊斯公司和法国屠波梅卡公司共同制造，双方的机会均等。同样，法国和联邦德国联合制造 A-J 超音速喷气机，这是一种对地面实施攻击和教练两用机；设计和销售中均很成功的中程军事运输机协同式，也是法、德合作的项目。在导弹方面，有英法联合制造的“玛特尔”空对地导弹，法德联合制造的“罗兰”式地对空导弹。在直升飞机和坦克的生产方面，也有许多事例使人相信欧洲的武器生产国之间系统的合作已经开了头。

不过迄今为止，这种合作还只是一项一项地搞。另外，在这种合作中，每个成员国首先关心的是，千方百计地保障它所花费的投资能作为利润赚回来。欧洲国家之间合作的这种分散性使得美国制造商特别是航空方面的制造商，可以继续统治欧洲市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国家出于对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忠诚，宁愿选用强大的美国保护人的产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大西洋彼岸的制造商开出的销售价格更具有竞争性。

因此，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落实自己拥护欧洲统一这种信念的欧洲国家，必须在下述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购买价格便宜的美国装备，要么购买地道的欧洲装备，价格虽然贵一些，但这有助于维护共同体的军火工业。这种抉择的赌注是政治、技术和经济三重性质的。目前，军火生产分散于欧洲各国，只是因为存在着极少几个合作项目，这种分散性才显得不那么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处于商业上的统治地位。对于这种在政治—军事上依赖美国所造成的后果，欧洲人只能责备自己。

然而，只要发挥共同市场的一切潜力，实行一项发展欧洲军火工业的政策，就可以逐步改变这种欧美之间的不平衡状况，使之朝着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变化。

## 联合的优越性

为了证明欧洲国家的共同行动能使它们更好地克服自1973—1974年以来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欧洲共同体走上了制定迄今缺少的共同工业政策的道路。早在1973年12月14—15日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首脑就作出保证，“要在各个领域更积极地推行工业、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政策”。

这个雄心勃勃的构想至今还远未实现。但是，自从能源

价格暴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猛增以来，重新分工的客观需要正在推动着一项共同工业政策的形成。共同体委员会从解决最急迫的问题入手，对某些生产部门的保护主义加以制止，不管这些部门是否经得起价格的竞争（如纺织工业、钢铁工业、造船工业）或者是否受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影响（如炼油工业）。

依靠共同体的财政资助，根据罗马条约规定的职权和条例，共同体委员会应帮助各个机构作出安排，拯救受到威胁的工业部门。例如，跟共同体以外的出口国（如日本和某些发展中国家）谈判反倾销协定，或者制定最低限价；在共同体内部，采取转产和结构调整措施。只要有足够的财政手段，欧洲共同体这个同质性的利害关系一致的经济组织，便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地区政策和工业政策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

这种发展努力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生产部门，而应该包括建立增值率高的新兴工业，这些新兴工业部门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熟练的劳动力，可以使欧洲国家在国际竞争对手面前，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最有远见的欧洲共同体的拥护者们曾经一再指出，共同体缺少一项共同的工业技术政策，而这种政策应当在各种共同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共同军火生产工业的创建将成为总的工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构成它的基础。

这是欧洲议会 1978 年 6 月 14 日在通过德国议员埃贡·克赖普施关于“欧洲在军备采购方面的合作”的报告时得出的结论之一。由于共同体议会从制订工业政策入手来讨论欧洲安全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避免了正面挑起思想政治方面的

反对情绪。然而，欧洲议员们通过要求共同体委员会尽快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一项落实常规武器生产的欧洲行动计划，却把共同体的职权范围扩大到了一个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

面对美国的生产潜力，欧洲的航空工业、造船工业和电子工业若是没有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的同时资助，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可能发展。最近几年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表明，尖端技术的研究和系统应用是在民用和军用两方面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努力下实现的。对于防务合同引起的补偿和平衡问题，如果共同体能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统一的经济和贸易环境，那就会很容易地找到解决办法。迄今为止，欧洲人虽然成功地在贸易和农业方面创立了共同环境，但是，他们在利用这种环境所蕴藏的发展潜力方面，却做得实在太少了。

## 扩大欧洲预算

当然，还有法律和财政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共同预算。它是由整个共同体的机构加以制定、通过、执行和监督的。欧洲预算扩大到军事工业部门将是推行共同政策所取得的进步在财政上的反映。况且，人们对列入本年度预算的支出分配情况的批评，对共同预算在一体化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批评，都是严肃的。人们说，1979年的共同体预算总额不到一百七十亿美元，仅相当于九个成员国国内产值的0.8%约占各成员国国内预算的2.5%，实际上它只能满足农业方面的需要。共同体的预算应该逐渐成为资助各项共同政策的真正手段和保证

经济稳定的工具。

1977年3月,麦克·道格尔先生向欧洲委员会提出的研究“公共财政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的共同体向联邦阶段过渡,取决于共同预算的公共开支能否从占共同体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1%增加到大约20—25%。这种新的预算分配方案,将使共同体机构获得类似美国或德国的联邦政府的那种作用,果能如此,则将标志着欧洲统一运动大功告成。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在过渡阶段,应首先建立一种职权较小但包括防务在内的共同组织形式,这个组织机构应当拥有占欧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10%的财政手段。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财政权的转移只剥夺了各国行政当局现有财政手段的很小一部分,可是它将使欧洲联盟发生决定性的质的飞跃。

无论是采取成立“欧洲军备局”的形式(如廷德曼斯报告提出的那种设想),还是把预算纳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范围之内(这样,共同体的预算手段将随之增加)在欧洲范围内实行一种共同的军备生产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因为,这一政策不仅为各国在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带来好处,而且展现出朝着工业、技术和财政一体化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的前景。

## 第八章 今天的可能和明天的希望

欧洲，没有政治上的联合，就不可能有防务上的联合。但是，没有防务上的联合，政治上的联合到时候也是不可想象的。

欧洲建设及其防务建设的一切困难都来自于这种相互依赖。然而这种相互依赖又是欧洲全部希望之所在。事实上，不管政治联合看起来是多么困难，但它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它是欧洲大陆的生存条件之一。基于同一原因，欧洲的联合防务也一定会应运而生。

但是，难道现在就不存在欧洲政治联合的某些基础条件，从而可以推动建设某种共同防务吗？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确定“今天能做什么”。

至于明天希望做什么，我们在谈及未来的欧洲政治联合时，自然会予以考虑。

然而，我们谨防陷入空想。我们知道，困难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只是进行一些实际的谨慎的分析，而不是要提出一项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意图主要是指出一个方向或某些可能性。

### 今天的可能

欧洲的政治联合目前尚处在萌芽状态：欧洲理事会、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和最近普选产生的议会构成了一个雏型。现在

难道不是到了设计一种与政治联合的、与目前水平相适应、与  
之齐头并进、并且推动其建设的欧洲联合防务的时候吗？

欧洲理事会实行一致通过的原则，实际上已具有一个政治  
上合作的欧洲的性质。因此，今后的问题是，在各国元首和  
政府首脑的推动下组织欧洲的合作防务。

那么，当前的形势有利于实行这种合作防务吗？是的，  
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欧洲大部分军界人士希望合作。他们在指挥岗位  
上最先感受到民族防务体系的全部缺陷。他们天天都在体验  
着这种范围狭小的防务体系所固有的弱点。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这些欧洲军人相互之间、同事之  
间、盟国之间 都是很了解的。

在这方面，应当强调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三  
十年来，北大西洋公约通过联合参谋部的工作，通过交换专  
家、部队换防和联合军事演习，密切了欧洲各国的军队和士兵  
之间的关系。

凡是参加过盟军的联防和军事训练的人都知道，在这类  
行动中，各国军队在训练方法和精神状态方面相互学习的精  
神远远超过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随着共同活动的增多，增加  
了他们间的真正的战友情谊。正如克洛兹将军所说的那样：  
“欧洲范围的和大西洋范围的合作，实际做的，远远超出了目  
前的政治水平。”<sup>①</sup>

今天，任何军事问题所固有的民族概念，确实不再是各国  
部队和参谋部之间进行欧洲范围的合作的障碍了。



所以，欧洲各国军队是欢迎任何形式的欧洲防务的。可是，这种情况怎么让政界人士接受呢？

关于上面的合作防务计划，如果欧洲国家认识到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会带来好处，同时又不因此损害其中任何一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它们就会参加。所以，这就要求把各国关心的主要问题纳入共同的防务体系，同时又要努力保持这种体系的有效性。那么，这些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对于法国来说，是指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这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法国的威慑力量仍需由法国控制；其次，拒绝重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机构；最后，法国在世界上有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的自由。

对于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来说，忠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是首要的。联邦德国也是这样。在联邦德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忠诚还伴随着对西欧联盟的敌视，因为西欧联盟反对任何靠向北大西洋公约的举动。

因此，似乎只有一种欧洲军事防务形式能大体上使各方都能满意，这种防务体系应当纳入一个具有“两根支柱”的大西洋联盟范畴之内：一根支柱是美国；另一根支柱是欧洲。这种防务形式既保留各国的防务结构，又规定出起码的相互支援的措施。

那么，这种形式的合作防务的特点大体上是什么呢？

### 起码的相互支援

当然，相互支援主要表现在核领域。对于法国和英国来

说，这就是从某些明确的地理界限出发，协调彼此的火力部署，为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法国既然提出了“扩大的庇护所”的概念，难道不能认为上面的解决办法是会被巴黎所接受的吗？在伦敦方面，无论如何，刚刚上台的保守党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想法，即同意在法英打击力量之间实行合作。

因此，如果考虑在法国、英国以及它们的伙伴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规定出核领域支持的程度，难道纯属空想吗？

当然，那些主张“民族堡垒政策”的死硬派是决不会同意把核防务扩大到“前沿地带”的。在他们看来，法国显然是个世外桃源，根据一种莫名其妙的自私性和缺乏现实感的教条，法国不能与比利时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共命运。

但是，即使在一场核冲突中，法国也不会而且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一旦美国的核保护不灵，法国的伙伴国家可能终将需要求助于法国的打击力量，求助于法国扩大的庇护所。

同样，对法国来说，盟国常规力量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大家互为补充，譬如，英法协调各自提供的核保护，与此相配合，非核的欧洲强国加强它们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保护能力。

为了推动这种合作，应当在大西洋联盟欧洲支柱的内部

《国防》杂志，1976年6月号第15—16页。

撒切尔夫人在1977年1月4日对《世界报》的谈话中说：“如同我们之间许多共同的合作项目所表明的那样，肯定有必要加强防务方面的合作。那么，比如在核领域，这种合作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显然，这取决于我们外交磋商的程度。”

发展“欧洲计划小组”的工作，欧洲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定要由这个机构研究提出和贯彻执行。

在法英核力量之间，将开展情报和“技术的交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当把它在核秘密的转让上对法国限制过死的态度放灵活一些。

最后，为了给未来的一体化打击力量打下基础，如有可能，就应由所有欧洲国家参加共同制造战略潜艇和发射装置。

这样，就会创立一支“欧洲核力量”。这是英国现任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从1972年起——当时他任国防大臣——就一直在衷心呼吁的。

相互支援除了要求协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之外，还应导致建立一支欧洲常规干预部队。这支部队要置于统一的欧洲指挥之下，由各国的特种部队组成。这种特种部队根据需要组建各种特遣队。

在反对国际颠覆的斗争中，相互支援还表现为各国内政部之间的合作。也许因为对付颠覆战争是一种燃眉之急，所以这方面的协作今天早已起步：它们互相交换专家和情报，共同利用资料等等。今后的问题是要使这种协作制度化。

最后，更重要的是，相互支援表现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各个经济领域内扩大合作。在这方面，主要责任显然将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肩上，它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经济委员会合作，加强其维护欧洲经济的政策。这类活动显然远远超出了单纯合作的范围，但是通过利用各项条约所提供的可能性，在当前就可以做到。在这种意义上，有可能制定出共同体范围的装备计划、地面工程设施计划、科学研究计划等等。

同样，通过欧洲货币体系，共同体还可执行货币保护政策和组织向外国提供贷款的政策。

可以把这种经济政策扩大到欧洲经济共同体至今还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的某些战略性领域。譬如，欧洲共同体可以担负起危机时期的能源分配以及观测卫星空间计划的制订等组织工作，建立起战略原料的储备。又譬如，可以制定一项欧洲的军备政策，而这一点可以说尤为重要。

这项军备政策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加以贯彻：其一，在欧洲独立计划小组范围内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其二，同美国开展真正有来有往的武器交流。

在这个问题上 将按‘双行线’的思想行事。为此 大西洋两岸应当制定出一项长时期的武器采购和武器生产的共同政策。这样，就能使欧洲各国的军火工业在美国的竞争面前避免垮台，因为这种垮台前景在中期之内是可以预计的。这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装备至少可以相互替换，而且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所以比目前各国自行生产同样多的装备花费要少。

总之，通过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之间的配合，通过各国军事装备实现互换，以及通过统筹利用资金，这种相互支援将为各国政府带来节省大量开支的益处。同时，当每个国家对外进行武装干预时，将从共同体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战略上的援助，特别是在后勤方面。可以预见，由于非洲或地中海面临的威胁不断严重，今后可能需要进行的干预会远远超过过去对沙巴或黎巴嫩进行远征的规模。因此可以断言，只有建立一支欧洲干预部队，才可能集积起今天已痛感需要的手段。

自然 建立这样的‘跨国’组织 并且使起码的相互支援的规定又要与各国的独立主权并行不悖，这在政治方面会产生许多严肃的如何决策的问题。因此，在一种合作防务体系的范围内，应当特别注意使掌管防务的各个方面的磋商机构运转正常，而这个机构只能是欧洲理事会。

但是，鉴于现代战争的时间性极强，迟一步就会招致灾难，所以，理事会的成员国必须尽快进行磋商。闪电式磋商可通过电讯系统进行，这种系统可以使各国政府首脑举行电讯会议<sup>①</sup>。

当然，任何集体讨论的方式都会使决策迟缓，在闪电战时代，这是不能容许的。这一点也就是合作防务体系的主要缺点之所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譬如，核大国和常规力量大国之间的相互歧视，这在一个共同体内是不堪设想的；还有动用干预部队的困难，因为某些成员国可能拒绝参与行动；此外，还有浪费、效率低和合理性差等问题。由于部队仍保持着各国的体制，因此，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上面这些就是允许各国分散行动所具有的弊病。合作就能统统克服这些弊病吗？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些弊病肯定会减少，当然决不会全然消失。而且，只要无人仲裁成员国之间的纠纷，这些弊病甚至还会故态复萌。这种合作防务体系在今天不管多么有用，但对处在威胁之下的欧洲来说，很快就会显得不够了。

因此，欧洲防务发展的归宿在于实现一体化防务体系。

电讯会议：通过通讯和显象技术，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立刻参与重要决策。

## 明天的希望

一体化防务，是把各种因素结合在一个严密的整体中。这种防务体系首先回答了人们对它是否具有有效性的忧虑。有效性是建立在决策迅速、能立即投入足够而多样的力量以及各个防务部门保持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要迅速作出决策，就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一个领导人，只有当他在紧急情况下独自拥有特殊权力、平时拥有基本权力时，才能提前组织好反击，需要时立即下达命令。古巴事件时，肯尼迪之所以能充分而明智地作出反应，就在于他能独自作出主要决定；他对军事机器、必要时对全国经济拥有全权，使之听从支配。最后，尤其是他显然得到当时团结自信的整个美国人民的支持。这些就是实施统一的、最权威的指挥的理想条件。

在欧洲，一个由全民选出的、对防务和外交具有支配权的总统是可能取得这些条件的。但是，欧洲显然还没有到达这一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我们那些具有议会制传统的伙伴国，会同意走这条路。

因而，从现实主义出发，应当考虑一种效能也许稍差、但比较容易办到的解决办法。例如，可以组建一个执行机构，或者设置一个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从而便于作出决策。

要实现第二个要求，即能做到及时投入足够而多样的力量，就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组织。

因此，在严格的防务领域以及在更广泛的具有两根支柱

的大西洋联盟范围内，这个最高权力组织应当拥有以下控制权：

第一，控制一支欧洲打击力量。这支打击力量由法英核力量合并而成。这支力量的动用和发展完全受共同体决定的支配。

第二，控制一支欧洲联合干预部队。

第三，控制一支欧洲战斗部队。

第四，控制一个欧洲空间观察组织。

第五，控制一个负责对各国经济、国内治安和科研等方面的要害部门进行协调、推动和指导的系统。

要做到以上各项，就要求各国交出它们的军事防务权，至少在危机时期如此。也要求各国承认一个单一的决策中心，这个中心有权在经济防务方面要共同体执行它的方针。

这样，欧洲理事会或某个欧洲执行机构就将拥有武装部队、行政部门和法规章程，能对各种形式的威胁作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应。理事会在制订和执行其决定时，还可以得到一个负责协调、参谋和情报的机构的协助，这个机构类似法国的国防总秘书处，包括一个负责分析形势的常设小组。这样，就能对威胁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击决定。

在这种体制下，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将发挥一种民主监督的作用。然而，这种监督作用不应导致决策过程的拖延。议会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年度预算和对总的防务政策进行辩论。

欧洲一体化的防务机构还应该符合第三个要求，即在不同的防务部门中居间协调。

法国的国防总秘书处隶属于总理。

在军事方面，要逐步地采取下述各项措施：

第一，师以上单位的指挥一体化。

第二，统一训练条令和部队编制。

第三，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后勤系统，包括建立共同的武器、装备、地面设施和后勤供应。

第四，各国武器装备从相互替换水平过渡到标准化，前者为合作防务体系之特点，后者为一体化防务体系所必须。

第五，创立一个欧洲情报局。

第六，统一各国军队内部的招募制度、服役期限、管理制度和军饷水平。

这样，一体化进程必将触及各国军事力量的基本的东西。然而，在象征性的东西方面，各国仍将保持其特点。例如，各国的军事单位仍保留它们的军服和传统。欧洲军队的军旗和军歌将享有与各国国旗和国歌同等的荣誉。

这样，既尊重了各国的军事力量统一的必要性，又保持了国家或地区的特点，而后者正是军队内部团结和充满活力的源泉。一体化决不意味着千篇一律。

在反恐怖主义行动方面，“欧洲司法实体”要体现在：

第一，各国刑事立法应协调一致化。

第二，建立一个“欧洲检察院”，对危害共同体治安的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提出起诉。

在经济方面，要在共同机构的领导下：

第一，设立欧洲货币，在世界范围内以一项共同的金融政策为其作后盾。

第二，通过各国工业专业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的军火工



业、航空工业和宇航设备工业。

第三，设立购买、储备和分配原料以及被视为战略物资的欧洲机构。

此外，共同体委员会现行的贸易政策、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将照常充分执行，即推行增加生产赢利、扩大和维护国外市场的战略，发展与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经济合作。

最后，在科技方面，要组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使欧洲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达到或者保持与伙伴或敌手相当的水平。要把重点放在航空、核聚变、海底和海洋资源开发、制造替代能源等方面。这些活动将由共同体的研究中心进行，并且是共同奋斗的目标。

与简单的合作防务体系相比，一体化防务体系涉及的面是如此之广，显然是一个质的重大飞跃。

在这种情况下，一体化防务体系不可能仅仅是合作防务体系自然发展的结果，到一定时候，应该由一个议会和某种机构化的欧洲执行组织予以推动。

所以，要建设欧洲防务，今天就应当致力于提高欧洲各国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文明是共同的，由此自然引出这样的结论：大家必须选择一个共同的权威机关。

这就是建设欧洲防务的愿望所具有的全部政治意义。在今天的欧洲，这种愿望最终会在危险形势的逼迫下，在危难唤起的团结精神的推动下，给共同体建设带来至今所缺乏的灵魂和活力。

总之，欧洲防务建设根本不是欧洲统一进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恰恰相反，它是推动欧洲建设的一种手段。

## 第九章 为培育一种欧洲意识而努力

统一的欧洲决不是一个徒具法律形式而无思想内容的空架子。现在的欧洲体制虽然是介乎于单纯的政府间合作和一体化之间的过渡形式，但已经具有纯粹欧洲人格的全部要素。这就是：贸易方面的共同利益，自关税同盟建立和共同对外税率实行以来所形成的专属共同体的职权；对第三国、特别是对五十四个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共同的对外合作政策；对能源和原料输出国的共同依赖性；行动方式和价值体系都渊源于同一部欧洲各民族多次相互交融的悠久历史这样一种共同的感情；都想避免核超级大国把世界分割成两极；都想对世界的前途施加影响；都不愿意因人口下降和脆弱的政治—军事体制的损害而到二十一世纪将处在靠边站的境地。

事实表明，树立和发展一种欧洲理想，对逐步实现政治联合和建立为共同体服务的独立防务是必不可少的。欧洲意识是在上面这些决定欧洲独立人格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之上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欧洲意识还有三条基本的原则：多元论、共同行动和意志主义。

### 多 元 论

多元论承认，同居于欧洲这个整体中的各国政府，有执行

选民所希望的那种政策的权利和手段。在欧洲议会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些大的政治集团，议员们不是集中在本国的议会党团之中，而是按其政治倾向分野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只有法国的戴高乐派单独组成一个集团。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还有几名爱尔兰议员加入这一集团。自由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欧洲人民党）和社会党人已经各自建立了泛欧联合组织，制定共同纲领，以便为未来的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作准备。

可是多元论本身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它是以通过自由秘密选举实现政权的民主更迭为前提的。所以，欧洲的思想意识是与一切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势不两立的，因为这种制度不是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取得其合法性的。实行民主更迭的这条金科玉律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即当某个成员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再实行这种更迭的时候，共同体应当对它采取何种态度。根据欧洲公众对于欧洲的思想意识接受的程度，共同体的反应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不同形式：一共存，二开除，三干预。

鉴于欧洲各种机构的生命是以其全体成员国的充分参加为前提的，所以与之共存就变得更加困难。然而，这个国家的部长们若无议会的授权就没有代表性，特别是，如果在斯特拉斯堡会议里没有这个国家的选民代表，那么，这个国家的参加就是个疑问了。

欧洲机构可以宣布从法律上予以开除，但这样做的结果，会使非民主国家事实上所处的开除地位正式化。另外，这个国家还可能被引向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并执行一种不是与伙伴国共同行动的政策。

最后的反应是干预，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也许是军事的。这意味着欧洲已在其成员国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致于某个成员国脱离整体被视为对集体的安全和正常运转的威胁。这个国家的伙伴们也许会宣布一种“共同主权”论，以此为自己的态度制造根据。这种理论可能认为，共同体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范围广泛，程度至深，任何一国的脱离不能不被认为是一种敌对行为。既然它伤害到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就有权进行自卫。为了援助闹分裂国家中的忠于民主原则的人士，共同体也将进行干预，因为对于那些攫取了政权、并得到共同体外部某个强国物质上支持的人搞的颠覆活动和叛乱阴谋，他们无力抵抗。

## 共同行动

第二项原则即共同行动。它是欧洲建设的最根本的基础。共同行动的原则是从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考虑出发的：任何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再也没有力量确保或者发展它在国际上的主权地位了。

二十世纪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时代出现了权力再分配。欧洲范畴这个概念就是与此相适应的一个组织阶段。它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区域集团。在它之前是绝对的民族主权阶段，这一阶段从中世纪开始到1940年发展到登峰造极、继而自行毁灭的地步；在它之后则是建立世界政府的阶段，未来若干世纪之后，人类很可能走到这一步。欧洲区域集团是唯一能够保证旧的国家结构在平等基础上与超级大国一道参与世

界事务的组合形式。

这样一种组合形式具有榜样的作用。它在国际关系中开创了一种富有革新精神的进程，它以共同机构内部的、由条约规定和自愿组织起来的平等和法制关系取代了实力和霸权关系。欧洲的议会、行政、司法等一整套组织机构构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它既能维护各国的民族特性，又能在民族主权无力应付世界性压力的领域里，引导成员国逐步一起行施一种共同的主权。

凡是在地理、文化和种族等方面有共同联系，在政治、战略和经济等方面有相同利益，在广泛的总体范围内有实行联合之必要者，上面提到的进程都是适用的。只有在发展方面落后于欧洲实际、报复心强的民族主义力量，大概能够阻止这种基于一致原则的联合体的形成，如在近东、非洲、中美洲或东南亚等地区。假如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抱残守缺，只局限于民族国家这个传统的采邑，那只能有利于超级大国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应该预见到，这种共同行动的原则在近期内不会引起其他地区的组合进程。思想落后于形势，唯恐东西方对抗和非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那种“既成的混乱”遭到破坏，这一切难道不正在妨碍着这项原则的实行吗？

## 意志主义

构成欧洲思想意识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意志主义。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可以改造自然，可以决定自身的命运。确信这一

点，是西方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欧洲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的意志主义最系统的理论应用之一。不幸的是，它抽掉了意志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正当基础：这就是肩负世俗权力、具有精神信念自由的人应该得到全面发展。

欧洲统一事业最具体地反映了一种不断追求进步与适应各种压力的意志，而一切信奉宿命论的人民却屈服于这些压力。当欧洲人向竞争者的压力、向对手的威胁表示屈服的时候，他们就背叛了祖先的遗风，玷污了欧洲文明的精髓。

没有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集团可言。只有当欧洲人实现这种必要的协调一致时，才能产生休戚与共的愿望，产生建设维护其特殊利益的独立防务的意志。而协调一致本身是以承担明确的义务为前提的，它意味着彼此相互友爱，不发生重要争执。

功用主义的方法对于推动欧洲的思想意识从厚望到实际的发展肯定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持这种主张的最忠实的捍卫者们，现在却走到了主张建立一个“物质化的”欧洲的狭隘天地里去了。对于今天这个样子的共同体建设，人民中的广大阶层觉得与己无关。但是，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欧洲目标，更为大家所关心、更符合今日的愿望，那么，他们就会感到这一目标与自己息息相关。这个目标就是：追求一种最终目的，使精神的东西高于物质的东西，关心质量胜过关心数量。

### 相互依赖的必然性

关于经济或军事方面的干预权，尽管是为了扭转可能危

及整个欧洲安全和生存的局势，但在实践中似乎仍然是行不通的。欧洲共同体的某个成员国政府，哪怕只是畏畏缩缩地干预一下某个伙伴国的政治生活，也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应。譬如，1976年7月施密特总理宣布，如果在意大利发生共产党参政的情况，联邦政府将停止向意大利提供经济援助。结果，不论在巴黎、罗马还是在伦敦，这种干涉都受到了指责。1978年3月法国立法选举前几天，丹麦首相耶恩森只是流露了一点意思，说他将对左派政党的胜利感到高兴。当时，法国当局的恼怒也是同样的强烈。

对于外国首都诚恳地、有时是笨拙地表示的关心如此敏感，很快就要不合时宜了。随着共同体国家之间团结精神的具体化，相互间财政转让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对于资金使用条件的相互监督权，即使这些资金是经共同体委员会这个渠道分配的也罢。这种监督权表现了一个与其伙伴国的前途密切相关的国家的感情，所以就越发合情合理。这种监督权是团结的条件。

然而，不能把这种逻辑引申到极端，即让德国或法国这些最富的国家享有与其财政能力相适应的权力，去干涉邻国的事务。这样，小国就会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大国的霸权之下。共同体的联系正好能避免令人难以容忍的依附观念。这种联系正在各国官员、部长和政府首脑频繁的定期会晤中建立起来。他们按规定互相交换意见，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各个领域安排相互间的援助工作。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多，人口和经济的差别小，这就消除了支配别国的企图。这样，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不

久还有西班牙 就构成‘ 大国 ’集团 而其余五国再加上希腊和葡萄牙，就构成“ 小国 ”集团。虽然法国和德国曾经几次在实际上结成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联盟，但是，它们两家并不能操纵一个九国的整体，更不用说十二国了。意大利和英国从未打算搞那种四国执政、而让小国只能列队听令的把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经济实力强，所以它们与德国的联系比与意大利和英国的联系更密切。

建立共同体的方式是以克服传统的结盟思想为目标的，因为这种传统结盟思想以维持平衡为托辞，主张建立动辄兵戎相见的对抗集团。而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能够促进相互信任的不断增长。如果缺乏相互信任，一个成员国对另一个成员国国内生活的过分关心，就会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企图，尽管在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团结精神的表示。

今天，人们正在思考着，不知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把无知和恐惧引起的恩仇宿怨——这种恩仇宿怨为千百年来的武装对立所激化——从人们的思想中清除掉。统治别人的本能欲望是缺乏安全感的反应，是西欧国家今天再也没有理由加以宣扬的相互抵销的需要。客观上促使它们团结的东西远远超过使它们分离的东西。请看，在华沙条约国西部边境集结了多少个苏联师啊！在罗马、巴黎或波恩，那些动摇民主制度的恐怖分子们的血腥敲诈活动又造成了多少受害者啊！难道这一切还不足以促使欧洲人觉醒吗？

在当前这种对共同体的理想无动于衷的气氛中，是无法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和防务联合的。因此，支持欧洲统一的人们，现在应该开展一场教育和说服工作。



## 第十章 共同防务：维系大西洋 团结与建设欧洲机构

### 徒劳无益的隔阂

任何旨在建立一种欧洲防务组织的努力，如果被认为是要削弱大西洋安全体系，那么，它是注定要失败的，至少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状况下是这样。

欧洲统一事业的反对者和历来敌视美国的中立主义的拥护者所鼓吹的辩证法是不合逻辑的，是居心叵测的，因为他们所鼓吹的所谓“辩证法”把放弃大西洋联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作为欧洲国家之间加强政治联系和军事联系的前提。

欧洲某些政治组织严重存在的潜在反美主义，不仅不会促进欧洲的统一，反而可能成为欧洲统一的重大障碍。这些组织对美帝国主义的揭露轻易地征服了某些转眼就变成忘恩负义的人们，尽管他们在 1945 年曾经把我们的盟国作为解放者来加以欢迎。虽然法国对雅尔塔协定规定的两极霸权的谴责有时并非过份，但是，波恩、罗马或哥本哈根的考虑却截然不同，它们所关心的首先是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实际出路。如果要使为欧洲共同体的事业而奋斗的人们接受这种逻辑，即建设欧洲防务必须摈弃他们的国家为维护“自由世界”而承担的条约义务，那么，他们肯定会产生对欧洲防务建设的赤裸裸

的敌对情绪。

如果说欧洲防务对于充分保障欧洲大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独立人格是必要的，那么，对于加强大西洋联盟的可信性同样是必要的。欧洲国家之所以和华盛顿共同签订一项相互援助的公约，并不是为了盲目地效忠于可能跟欧洲利益不一致的美国利益，而是为了尽可能扩大欧洲安全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美国人使我们免遭莫斯科的控制，而我们却说美国人一心要控制我们，这难道不是错怪他们吗？1966年戴高乐将军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离开法国领土，这一举动并没有遭到反对，这证明大西洋的团结是自愿的。1962年7月，肯尼迪在费城提出建议：以美国为一方，以即将联合起来的欧洲国家为另一方，在一个基于两根支柱的大家庭内部，组织政治上的“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从来没有把肯尼迪的这个建议束之高阁。此外，美国政府在1951年赞同了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尽管它在一年以前认为立即重新武装德国，接受它加入大西洋公约，是使之参与西方整体防务更有效的手段。

我们大西洋彼岸的伙伴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一条相当简单的逻辑：强大的盟友比虚弱的主顾更有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承认欧洲共同体并与它合作，都是美国人通常执行的支持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尼克松政府特别是基辛格向欧洲人发出的轰动一时的指责，只是在欧洲人把分歧公开化，并且表明他们不能与美国一致对付1973年秋天石油生产国的挑战之后才爆发出来的。当人们感到欧洲的空白状态已经构成对自由世界利益的严重威胁时，才产生了

在美国领导下加强西方世界团结的意图。

### 重建大西洋两岸的平衡

美国并不希望欧洲因分裂而削弱，反而三番五次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在防务方面协调它们的努力。1978年1月6日，卡特总统在访问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时提醒说：“美国一直希望有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欧洲作为捍卫我们的人民所共同信仰的价值观的同盟军”，他声明准备在不同方面与共同体一起努力。1977年5月10日，美国总统在参加北大西洋联盟伦敦首脑会议时，更为具体地接受了这种意见，即美国应该在防务装备方面发展真正的大西洋贸易的“双行道”制度。这次会议最后公报的第四段也主张，“在联盟的欧洲和美洲成员国之间，在防务装备的采购方面建立更为平衡的关系”。

因此，欧洲人完全可以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放手创造重建平衡的条件，这将有利于出现一个欧洲极心。联盟的欧洲成员国，不管是否属于北大西洋公约军事机构的成员，其首要任务是结束它们在常规武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和美国在武器贸易方面的不平衡是1比10，而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则是1比40。随着欧洲政治合作的加强和共同机构的巩固，欧洲在政治上对国际问题看法的独立性，抵制美国压力的能力，以及影响华盛顿外交的能力，都一定会相应增强。

## 西德—美国勾结的神话

鉴于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在东西方对抗中所代表的政治份量，所有这一切对于欧洲今后如何演变，是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几年以来，联邦德国对华盛顿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立的态度。西德—美国勾结企图统治西欧的形象只存在于那些偏执者的头脑中，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分析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真正关系。施密特总理的德国曾多次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对它的传统保护人美国发出信息，德国对支持美元和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提供资助感到厌烦了，它决心做一个捍卫自身利益的贸易伙伴，使各国都尊重正当的贸易竞争。两国的争论逐渐扩展到推动工业增长、援建核电站（特别涉及到西德—巴西间的合同）向西德提供铀燃料以及美苏战略会谈的某些方面。

由于只有联邦德国拥有足够的财力去具体落实欧洲联盟的奠基者们所确定的团结友爱的目标，所以它在共同体内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但是，只有当联邦德国感到共同体的其它伙伴们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欧洲统一的道路时，它才会进一步增加对共同体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贡献。波恩政府从成立之日起，之所以对大西洋组织表现了无条件的忠诚，主要原因并不是它要莫名其妙地效忠于 1945 年的战胜国，而是因为它感到，单是在欧洲范围内找不到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1954 年的巴黎协定剥夺了德国建立民族核威慑力量的可能性，从那时起，德国从来没有看到法国或英国会提出这样一种建议，

即让德国分享某个欧洲伙伴国的核权力。对于德国全面地平等地参加新的欧洲大家庭虽然作出了这种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止德国始终不渝地奉行一条赞成共同体一体化的政治路线。波恩把加强共同体机构当作是对其伙伴的一种考验：这种加强将证明，每一个伙伴国都决心与一直受威胁的德国共命运 与它同欢乐 共患难。

尽管有 1963 年的法—德条约的意向声明，尽管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曾经相互大谈友好，但巴黎的态度并没有为此提供充分的保障。1976 年春天，法国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扩大的庇护所”的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 法国的防御界限可能从莱茵河扩大到了易北河，也就是说包括了联邦德国的领土。法国的这一转变受到了德国人的热烈欢迎。

可以设想，随着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防务体系的建立，大西洋两岸在辩论中的地位将彻底改变。当欧洲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对他们的强大伙伴的完全独立地位以后，他们只会更乐意增加对联盟体系的信任，因为他们是在 1949 年力量虚弱时加入这一联盟的。欧洲人在组织自己的防务力量方面取得某种程度的可信性，并不意味着要动摇欧洲人与美国人的联盟关系和他们共同的最高价值观。

## 实现欧洲联合的实际道路

欧洲共同体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赖以缓慢发展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具体地规定出一体化的完成日期或最后形式是没有任何好处的。1950年开始的欧洲建设是一个不断创造的

过程，它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把各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无法单独有效行施的那部分国家职能，逐步赋予共同的机构。应当把在贸易方面和在农业方面成功地实现了的东西（对农业方面的积极成果，人们宣传的不够），把成员国打算在货币领域和经济政策方面一道做的事情，推广到外交和防务方面。

如果不是陈腐的沙文主义的残余在作怪的话，是不能把政治问题排斥在欧洲共同体的目标之外的。罗马条约的签字国曾经发表声明，“决心为实现欧洲各国人民日益紧密的联合奠定基础”。欧洲理事会的建立增强了共同体的政治形象。自1974年12月以来，出席理事会会议的各国政府首脑形成了每年至少要会晤三次的习惯，以便极其坦率地讨论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在这个最高机构内部，个人之间友谊的增强有助于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从而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使重大问题得以直接提出来，而不受那些把国际会议弄得枯燥无味的外交形式所束缚。

在这个机构内部，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各国领导人讨论安全、经济和军事问题。为了给各国首脑的会晤做准备，或者为了落实首脑会议的精神，各国首脑可以授意召开各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的会议，也可以责成共同体的委员会负责提出军火工业政策方面的建议，提出技术方面的意见和全面的看法，以解决建立欧洲防务组织后必然会引起各种困难。

## 勇气的价值

如果缺乏一种明确申明的政治意志，这些困难似乎是难

以克服的。无视反对改变现行欧洲安全体系的阻力，那是超脱尘世的盲目乐观。必须考虑到现有结构所固有的惰性、官僚主义者对变革的恐惧心理以及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偏见的压力。但是，因为害怕潘朵拉盒子<sup>①</sup>里会冒出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理就不敢打开它，这种伪善心理并不能使一切真正的欧洲人感到快慰。

奇怪的是，欧洲防务问题是这样一件少有的事业，它不仅发挥一副有益的泻药的作用，而且能使欧洲主张独立的顽固派和一体化的无条件支持者相互接近。如果出于党派斗争的策略考虑，或者为学说的偏见所束缚，从而拒绝防务建设问题在群众中展开广泛辩论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辩论决定着欧洲的前途，尤其决定着走向欧洲联合的每一个进步。

## 普选的动力

直接普选欧洲议会议员的决定，从本质上讲，有助于加速提高欧洲人的集体觉悟，使之认识到他们可以安排一种共同的命运。1978年4月7日，各国政府首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确定1979年6月进行第一次选举。他们强调指出了这一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通过了一个“关于民主的声明”。声明说：“直接普选欧洲议会的成员对欧洲共同体的前途是一件带有根本意义的事件，是组成共同体的各国人民所共同具有的民

潘朵拉是希腊神话中人类第一个女人。据希腊神话，神王宙斯给潘朵拉一个盒子，后来盒子打开，里面所装的各种祸害就被放出来散布人间，喻作一切祸害之源。——译者

主理想的光辉体现。共同体是罗马条约所倡导的欧洲各国人民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合的基础，共同体的建立，显示了共同体奠基人进一步维护和平和自由的决心。政府首脑们重申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所珍视的法律、政治和道德范畴的价值观得到尊重，捍卫代议制民主、法制、社会正义和尊重人权等各项原则……”。

那些主张竭力缩小欧洲共同体的目标和手段的人们，与这项开辟了广阔前景的声明是不相容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欧洲理事会和直接普选出的欧洲议会很可能成为一种准联邦结构的两极，而这种结构是可以获得难以预料的发展的。这样，跨政府的权威和议会的合法性相结合，只要它善于发挥综合与推动的作用，就会赋予共同体委员会一种活力。欧洲议会因普选而被赋予新的合法性，它首先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条约授与一切权力，特别是在预算方面。

应当按照下面的指导思想安排欧洲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不论是议会机构、执行机构还是司法机构，任何一个方面的加强都须有利于整体，并促成进一步的调整，以扩大共同体的职权范围。

## 欧洲，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在目前创建阶段，就立即为明天的机构形式规定出大致的轮廓，既为时过早，也是不自量力的，因为明天的机构是今天的欧洲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发展的结果。

1974年正式开展的关于欧洲联盟机构问题的辩论，至今



尚未达到一些人所希望的、而另一些人所担心的那种规模。欧洲各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找到解决本国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恰当办法。但是，这种努力至今收效甚微，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为寻找本国的出路而常常忽视发挥共同行动的作用。

现在，一种程度更高的协同努力似乎正在取代这种各自为政的对策。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和继续实行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政策，是确立欧洲的独立人格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各国政党、新闻机构、舆论界都为迎接第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而动员起来，这是确定独立人格的第二步。

关于欧洲建设的构想，如果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出发，在共同体范围内提出解决就业困难和物价上涨的办法，那么，这种构想就会具有生命力，就会引起公民们的广泛兴趣。可是，为了使这种构想获得全部意义，比较难办的政治方面和机构方面的问题仍然是主要的。政治和机构方面的建设应当齐头并进，欧洲防务问题当然也就包括在其中了。

## 结论：冲破禁区

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只是向读者介绍某些观点，并不想做什么结论；我们希望以此对围绕首次欧洲议会选举展开的辩论作出贡献，所以既不存党派偏见，也不拘泥于教条思想。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心中怀有某种忧虑感，但又抱有深切的希望。

一方面，在欧洲人民的心目中，欧洲统一事业最终变得切近了，迄今只是习惯于接受共同体现实的人们，现在也可以对之施加影响了 另一方面 令人担心的是 未来欧洲的一个基本方面——防务建设，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所以，当人们预见到一个有关集体利益的政治问题具有极大微妙性（如果不说它是爆炸性的话）的时候，就应该迅速将这问题交付公众讨论。

因为，我们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抱有希望。我们对欧洲理想的任何支持，都建立在两种感情的理智结合的基础上，既忠于我们的祖国，又对多元化代议制民主充满信心。极权主义和偏执狂会驱使惊慌失措的人类可怕地丧失理智。我们这一代人虽未遭此不幸，但我们热切地希望也为后代创造一个和平自由的世界。研究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远不是少数几个人力所能及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揭示什么真理的奢望。不过，我们只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即鼓舞那些主张建立欧洲防务的人大声疾呼地说出欧洲统一的支持者窃窃私语的想法。我们的努力不是全然无益的。

## 欧 洲 广 岛

我们之所以把欧洲与广岛相提并论，不但是为了形象地说明我们的担心，而且还通过本书的论述，来反对欧洲各国闭眼不看现实的态度。人们实在担心这种态度会使欧洲国家遭受覆灭或奴役。

那么，建设一个有防务的欧洲是否有可能呢？